

## 清代江南士民生活的空間與人文地景

——以蘇州山塘為中心

馮 賢 亮<sup>\*</sup>

摘 要

晚明以來的江南地區，人文景觀與生活環境一直發生著變革，並特別明顯地體現於城市的日常生活中。而在城牆之外的生活空間，能特別引人注意者，就在蘇州城閶門外至虎丘的七里山塘。這是一個極適於休閒而富於逸趣的地域，且與虎丘並聯，構成了吳中重要的遊賞之地。發展至清代中期，山塘生活的富麗與景觀的別緻，以及那些包蘊在各種文字記述中的空間感覺與地方認同，都被明顯地注入了不同時代人們的情感，當然也使人們更加清晰地感受到山塘所兼具的地方特質及其時代變化。作為城鄉娛樂與休閒的集聚區，山塘的人文地景自明末以來確實有豐富和擴張之勢，並最終成為世人眼中的煙月作坊之地。但從清代後期開始，山塘地景發生了巨變，原有的生活圖景及其人群表現出了地域轉移之勢。與江南的其他地方一樣，山塘的繁華也轉移到了上海，昭示出歷史轉換對士人生活選擇的影響至深且廣。

關鍵詞：清代、江南、山塘，生活空間、人文地景

---

<sup>\*</sup> 作者現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Living Space and Human Landscape of Gentry and Citizen in Jiangnan Delta During Qing Dynasty**

—Focusing on Shantang, Suzhou

Feng Xian-liang

Abstract

Human landscape and living space in Jiangnan have been changing since the late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reflected in urban daily life. The most attractive living surroundings outside the city walls was Shantang, located between Changmen and Tiger Hill, which was stretching 3.5 kilometers and was the place replete with relaxation and refined interest. Linked with Tiger Hill, it became a famous tourist attraction in Jiangnan. During the middle Qing Dynasty, the affluent life and unique landscape of Shantang, together with the sense of space and identification from all descriptive records, were endowed with people's sentiment from varying dynasties, which vividly demonstrated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ing times of Shantang. As a local center of recreation and relaxation, its human landscape had been enriching and expanding since Ming Dynasty and eventually became Romantic place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however, Shantang's landscape has undergone a great change which was the location transference of life and dwellers. Just like other places in Jiangnan, Shantang prosperity was transferred to Shanghai, illustrating the profound influences of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life choices of gentry and citizen.

Keywords: Qing Dynasty, Jiangnan area, Shantang, Living space, Human Geographical Landscapes

## 清代江南士民生活的空間與人文地景

——以蘇州山塘為中心\*

馮賢亮

### 一、引言

在現代地理學者的觀念中，蘇州山塘已是一條著名的「古街」，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資源與文化空間。<sup>1</sup>而在晚明時代人們的意象與實際感受中，山塘本身是一條城外交通的河道，所謂「一望似秋河」。<sup>2</sup>從閶門外蜿蜒折西北，流向七里外的虎丘名跡，<sup>3</sup>構成了一道獨特的人文地景。其中有一段山塘街被稱作「白公堤」，是唐代白居易（772-846）任蘇州刺史時，為溝通南北水利所築，故稱。<sup>4</sup>因此可

---

\* 本文係中國大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資助項目（2011年度）之階段性成果。

<sup>1</sup> 參見牛示力編著：《明清蘇州山塘街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sup>2</sup> （明）牛若麟、王煥如纂修：崇禎《吳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明崇禎間刻本），卷1，〈形勝〉，頁8a，「吳縣志圖」，頁11b。

<sup>3</sup> （清）徐崧、張大純：《百城煙水》（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1，〈蘇州府〉，頁25。

<sup>4</sup> （清）尹繼善、趙國麟修，（清）黃之雋、章士鳳纂：乾隆《江南通志》（乾隆二年重修本），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31，〈輿地志·古跡二·蘇松二府〉，頁40b；（清）吳秀之等修，（清）曹允源等纂：光緒《吳縣志》（蘇州：蘇州文新公司，民國22年鉛印本），卷19，〈輿地考·山〉，頁27b。

以說其早期功能的表現，就在溝通運河、便利水上交通等方面。據乾隆年間人們的說法，白公堤的具體位置，在山塘的「通濟橋至半塘橋，長三百丈有奇，闊三丈有奇，此為白公堤之東段；半塘橋至西山廟橋，長二百五十丈有奇，闊四丈有奇，此為白公堤之西段。」<sup>5</sup>半塘橋所在，正是七里山塘的中間地段，<sup>6</sup>所謂「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sup>7</sup>而白公堤以此為界，被分成了東西兩段，都構成山塘街市的核心。相對而言，近閶門外的那一段，毗鄰閶門外繁華市街（南濠街至閶門外吊橋一帶），<sup>8</sup>而頗形熱鬧。<sup>9</sup>山塘河兩岸的街市生活與空間景觀，已經十分豐富。可是，離虎丘東偏的山塘地方，即有五人墓和葛將軍墓，作為對明末時世「英雄」式人物懷念的象徵，略微顯出環境的荒落與時代的悲情。<sup>10</sup>

當然，在眾多清代士人的記述中，山塘地區雖然還不屬於一個商品經濟意義上的獨立「市鎮」，但確實已是一個極適於休閒而富於逸趣的生活空間，且與虎丘並聯，構成吳中重要的遊賞之地：「春秋為盛，冬夏次之。每花晨月夕，仙侶同舟，佳人拾翠，暨四方宦遊之輩，靡不畢集。」清人甚至認為，早在白居易的宴遊諸詩中，已可窺見唐時虎丘山塘的這種繁盛景象了。<sup>11</sup> 乾隆五十三年（1788）舉人、

<sup>5</sup>（清）顧詒祿等纂，（清）李光祚修：乾隆《長洲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乾隆十八年刻本），卷15，〈水利〉，頁8b。

<sup>6</sup>（清）尹繼善、趙國麟修，（清）黃之雋、章士鳳纂：乾隆《江南通志》，卷25，《輿地志》，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23a。

<sup>7</sup>（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康熙三十五年刻本），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影印版），子部第155冊，卷4，〈撚須寄·乩詩〉，頁2b。

<sup>8</sup>曹子芳、吳奈夫：《蘇州》（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6年），頁78。

<sup>9</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10，〈市塵〉，頁143-151。

<sup>10</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5，〈塚墓〉，頁66-67。

<sup>11</sup>（清）沈德潛、顧詒祿纂，（清）許治修：乾隆《元和縣志》（乾隆二十六年刻本），收於《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誌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版），第14冊，卷10，〈風俗〉，頁8a。

長洲人王芑孫（1755-1817）則寫述了其感覺中的山塘情致與風雅：「七里山塘路，終年見畫橈。新花高出寺，臥柳曲遮橋。紅袖當爐坐，青簾隔市挑。春堤歸路晚，何處尙吹簫。」<sup>12</sup> 表明彼時山塘生活的富麗與別緻。

從總體上看，太湖平原地區的城市，與北方地區相比，更多地都是依河而建，且規模相對較小，沒有外城，城內街道狹窄，市街因而往往被迫擴張至城外，甚至更遠的鄉村地方。所以城市商業活動極盛的地區，不在城市的中心，而是極明顯地偏於城市主要通商路線的一邊。<sup>13</sup> 同時有研究者開始注意城市與腹地（四鄉）的關聯（主要著眼於經濟），<sup>14</sup> 亦注意到城市形態與城門的關係，<sup>15</sup> 城門外商品經濟中心的建構及其表現問題（如蘇州閶門外、鎮江西門外、杭州北關外等）。<sup>16</sup>

在江南這種典型的水鄉環境中，與河湖網路的布織有著必然聯繫的城市生活，<sup>17</sup> 自然而普遍地呈現出城外與城內相溝通的各類河道的

---

<sup>12</sup>（清）王芑孫：《淵雅堂全集·編年詩稿》（嘉慶八年刻本），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集部第1480冊，卷1，〈戊戌·山塘〉，頁11b。

<sup>13</sup>〔美〕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清代中國的城市社會結構〉，收於〔美〕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630。

<sup>14</sup>參見袁方：〈城鄉關係：敵乎？友乎？〉，《新路週刊》1948年第6期，頁11、13；費孝通：〈小城鎮大問題〉，《費孝通論小城鎮建設》（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年），頁86-88；戴鞍鋼：《港口·城市·腹地——上海與長江流域經濟關係的歷史考察（1843-1913）》（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

<sup>15</sup>章生道：〈城治的形態與結構研究〉，收於〔美〕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主編，葉光庭等譯：《中國華帝國晚期的城市》，頁105。

<sup>16</sup>李長傅編著：《江蘇省地志》（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鉛印本），頁101。

<sup>17</sup>參見〔日〕松浦章：《清代內河水運史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9年）中的有關章節。中譯本參見松浦章：《清代內河水運史的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

重要性與獨特性。在明代人對於蘇州府城的高度評價與誇示中，可以明顯地感受到這些意味：「凡設險守國，必有城池。若夫支川曲渠，吐納交貫，舟楫旁通，井邑羅絡，則未有如吳城者。故雖號澤國，而未嘗有墊溺之患。」<sup>18</sup> 其中，蘇州城外的山塘河，因為有了像唐伯虎（1470-1523）、余懷（1616-1696）、王翬（1632-1717，主持繪製〈康熙南巡圖〉）、徐揚（清乾隆年間宮廷畫家，生卒年不詳，繪有〈姑蘇繁華圖〉）、顧祿（生卒年不詳）、吳泰來（？-1788，繪有〈虎丘山全圖〉）等人的文字記述或圖像描畫，相比其他普通河道更受世人注意，讓人記憶深刻。不過，這些內容多屬斷片，不能構成完整的歷史連續體。所以倘要作系統、全面的還原，就因歷史較久、變化較多而變得不太可能。比較而言，顧祿在清代中期的紀錄，在諸多傳世文獻中，堪稱最為翔實。

顧祿是嘉慶、道光年間的吳縣人，在蘇州城外山塘的斟酌橋西面水邊置有別墅，生活逸樂；其休養期間，「白裕芒鞋，間與花農為釣叟相往還，遍歷名勝」的生活，深為時人所豔羨。<sup>19</sup> 他對虎丘山塘一帶山水、名勝、人物故事等，自然十分熟稔，寫就《桐橋倚棹錄》一書，刊行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書中詳細記述了清代中前期山塘地區人們的休閒生活和娛樂世界，揭示出當時江南城市休閒的一般情況和空間圖景。在該書的〈凡例〉中，顧祿擬定了虎丘山塘的一個生活空間，標明其具體的範圍為「東起山塘橋，西至西郭橋，北距長蕩，南盡野芳浜」。<sup>20</sup> 這也是本文要重點分析的地域構成。

從顧祿的文字表達中，可以略窺其生活時代山塘的空間景觀與生活情趣，同時參酌明末以來其他文人的零星描述，或可對山塘歷史作出一個概觀性的論述，從而呈現出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山塘

<sup>18</sup>（明）林世遠修，（明）王鏊纂：正德《姑蘇志》（正德間刻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影印版），卷16，〈城池〉，頁1a。

<sup>19</sup>（清）褚逢椿：《桐橋倚棹錄》序，收於（清）顧祿：《桐橋倚棹錄》，頁1。

<sup>20</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凡例〉，頁1。

所兼具的地方特質及其變化。本文即擬以此為中心，對清代中前期人們的生活與記憶，作初步的梳理，說明彼時山塘的生活景況與地方認同，以及那些包蘊在各種文字記述中的空間感覺。這些帶有觀念性的認識，又是如何被注入不同時代人們的情感，從而有可能產生與其他生活空間相排斥的地方元素，同時，又必須注意傳統時代城市生活的內外區分感或者說城—鄉差異在山塘地帶的淡化，<sup>21</sup> 揭示其間的歷史轉換對士人生活選擇的影響。

## 二、城鄉娛樂與休閒空間的營造

明清時期的江南，<sup>22</sup> 水網密織，環境優雅，城鎮經濟活躍，流動人口較多，服務行業興盛，文人、鄉宦、青樓名妓、俠客等人，頻頻出現於這些地方最優勝的去處；而且生活方便，資訊便捷，更有許多奢侈性的消費場所，共同建構了一幅繁華多彩的生活圖景。明人稱譽道：「三吳之水皆為園，人習於城市村墟，忘其為園。」<sup>23</sup> 似乎整個江南就可視為一座龐大的園林，且園中有園，人們享受著這一宏大園林勝景的逸趣，而忘其為園了。

在南京，有一個名勝之處桃葉渡，位於秦淮河與古青溪水道合流的附近，夫子廟利涉橋畔，今天渡口地方還立有「桃葉渡碑」，建了一個亭子。它的得名，據傳說要上溯到東晉時代王羲之（303-361）的兒子王獻之（344-386）。王獻之常在這裡接他的愛妾桃葉（東晉

<sup>21</sup> 這一點頗如蘇州人楊循吉很早指出的與山塘同樣並屬城外，且緊相毗鄰的閶門外南濠，可以說都有「帶郭連村」的特質，生活一樣熱鬧繁華。參見（明）楊循吉：《松籌堂集》（北京圖書館藏清金氏文瑞樓鈔本），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影印版），集部第43冊，卷3，〈記·葉氏南隱記〉，頁215。

<sup>22</sup> 有關江南的概念判定與學界的相關認識，參見馮賢亮：《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10。

<sup>23</sup> （明）鍾惺：《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21，〈梅花墅記〉，頁351。

人，生卒年不詳）渡河，當時河寬浪大，擺渡過河多少會讓人感到恐懼。王獻之寫了一首〈桃葉歌〉給桃葉，其詩云：「桃仙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sup>24</sup> 此後，人們就呼這裡為桃葉渡，渡口也慢慢發展為一個繁華之所，在晚明時已經號稱金陵二十大名勝之一。<sup>25</sup> 桃葉渡成了一些文人名士的寓居佳地。明末清初名士方以智（1611-1671），僑居在這裡一個漂亮氣派的水閣，居然成了東南名妓經常聚會、「四方賢豪」娛樂的休閒中心。<sup>26</sup>

崇禎十一年（1638）九月，張岱（1597-1679）坐船來到南京秦淮，去看望的老友閔汶水（明末清初徽州茶藝大師，生卒年不詳），也住在桃葉渡。<sup>27</sup> 再如蘇州人張魁（明末吹簫高手，生卒年不詳），形態秀美，曾將他的家安在桃葉渡，與「舊院」（即夫子廟西偏的板橋一帶）相鄰。他與當地不少妓家往來習熟，甚至妓院烏籠中的鸚鵡也認得他，會叫：「張魁官來！阿彌陀佛！」<sup>28</sup>

清代著名文人吳敬梓（1701-1754）的故居也在桃葉渡附近。他本出身於安徽全椒「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的官宦詩禮之家，可是在中年後因家道敗落，而且屢試不第，在雍正十一年（1733）率全家遷到了南京秦淮河南岸，正好在桃葉渡的北側。<sup>29</sup> 吳敬梓晚年撰有〈金陵景物圖詩〉23首，歌詠的正是南京名勝，包括杏花村、燕子磯、謝公墩、鳳凰臺、莫愁湖、雨花臺、琉璃塔、靈谷寺、桃葉渡、幕府山、烏衣巷、長橋、龍江關、鍾山等。其中有一首五律〈桃葉

<sup>24</sup>（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45，〈清商曲辭二·桃葉歌三首〉，頁664。

<sup>25</sup>（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6，「雅遊篇」條，頁198-199。

<sup>26</sup>（清）余懷：《板橋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中，〈麗品·珠市名妓附見〉，頁49-50。

<sup>27</sup>（明）張岱：《陶庵夢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3，「閔老子茶」條，頁24。

<sup>28</sup>（清）余懷：《板橋雜記》，下卷，〈軼事〉，頁56。

<sup>29</sup>參見王俊年：《吳敬梓和儒林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10-14。

渡〉云：「花霏白板橋，昔人送歸妾。水照傾城面，柳舒含笑靨。邀笛久沉埋，麈扇空浩劫。世間重美人，古渡存桃葉。」<sup>30</sup> 描述的正是桃葉渡曾經令人嚮往的休閒生活與美好故事。可是，吳敬梓的生活太過貧窘，大概無法做到明朝人的那種風流瀟灑。

長江北面的大城市揚州，在清代中期以前，商業的繁榮與生活的奢華程度，<sup>31</sup> 在當時中國也是屈指可數的。張岱撰有小文〈二十四橋風月〉，以優美的筆調，講述其記憶中的揚州風月、令人嚮往的生活逸樂：<sup>32</sup>

渡鈔關，橫互半里許，為巷者九條。巷故九，凡周旋折旋於巷之左右前後者什百之。巷口狹而腸曲，寸寸節節有精房密戶，名妓、歪妓雜處之。名妓匿不見人，非嚮導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薰燒，出巷口，倚徙盤礴於茶館酒肆之前，謂之「站關」。茶館酒肆岸上紗燈百盞，諸妓掩映閃滅於其間……人無正色，所謂「一白能遮百醜」者，粉之力也。遊子過客，往來如梭，摩睛相覷，有當意者，逼前牽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肅客先行，自緩步尾之。至巷口，有偵伺者向巷門呼曰：「某姐有客了！」內應聲如雷，火燎即出，一一俱去。剩者不過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燈燭將燼，茶館黑魘無人聲。茶博士不好請出，惟作呵欠，而諸妓驟錢向茶博士買燭寸許，以待遲客。或發嬌聲唱〈劈破玉〉等小詞，或自相謔浪嘻笑，故作熱鬧以亂時候，然笑言啞啞聲中，漸帶悽楚。夜分不得去，悄然暗摸如鬼，見老鴿，受餓、受笞，俱不可知矣。

張岱的族弟張卓如（明末清初人，生卒年不詳），長著一臉長

<sup>30</sup> 吳敬梓的這個作品，後來被江蘇巡撫、兩江總督陶澍收藏。1958年，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獲得了這個藏本。

<sup>31</sup> [澳]安東籬（Antonia Finnane）著，李霞譯，李恭忠校：《說揚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國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sup>32</sup>（明）張岱：《陶庵夢憶》，卷4，「二十四橋風月」條，頁35。

鬚，到鈔關必去狎妓，曾向張岱噓道：「弟今日之樂，不減王公。」張問其故，他說：「王公大人侍妾數百，到晚耽耽望幸，當御者亦不過一人。弟過鈔關，美人數百人目挑心招，視我如潘安，弟頤指氣使，任意揀擇，亦必得一當意者呼而侍我。王公大人，豈遂過我哉！」<sup>33</sup>

清前期人李斗（生卒年不詳）的《揚州畫舫錄》，雖以「畫舫」為題，但並不專述青樓，以其「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記錄了不少真切動人的史事。作為十七、十八世紀中國最為繁華的城市之一，揚州府城內「重城妓館，每夕燃燈數萬，紛黛綺羅甲天下」，<sup>34</sup>也十分令人嚮往。

而天下聞名的杭州西湖，當然更是一個人間勝地，至晚在萬曆初期已有西湖十景之說。<sup>35</sup>至於西湖中的樓船之盛，在江南地區極負盛名。西湖三船之樓，據說是明人包涵所副使創辦的，分大小三號：頭號置歌筵、儲歌童；次載書畫；再次侍美人。包涵所的聲妓並非一般的侍妾，都要見客。其住所，經常為時人豔稱。張岱回憶道：<sup>36</sup>

客至則歌童演劇，隊舞鼓吹，無不絕倫。乘興一出，住必浹旬，觀者相逐，問其所止。南園在雷峰塔下，北園在飛來峰下。兩地皆石藪，積牒礫砢，無非奇峭，但亦借作溪澗橋樑，不於山上疊山，大有文理。大廳以拱斗抬梁，偷其中間四柱，隊舞獅子甚暢。北園作八卦房，園亭如規，分作八格，形如扇面。當其狹處，橫互一床，帳前後開闔，下裏帳則床向外，下外帳則床向內。涵老據其中，扃上開明窗，焚香倚枕則入床面

<sup>33</sup>（明）張岱：《陶庵夢憶》，卷4，「二十四橋風月」條，頁35-36。

<sup>34</sup>（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9，〈小秦淮錄〉，頁197。

<sup>35</sup>（明）陳善等修：萬曆《杭州府志》（萬曆七年刻本），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華中地方第524號，卷18，〈形勝〉，頁6b。

<sup>36</sup>（明）張岱：《陶庵夢憶》，卷3，「包涵所」條，頁27。

面皆出。窮奢極欲，老於西湖者二十年，金谷、鄴塢，著一毫寒儉不得，索性繁華到底，亦杭州人所謂「左右是左右」也。

張岱在西湖邊上的別墅稱青蓮山房，「多修竹古梅，倚蓮花峰，跨曲澗，深岩峭壁，掩映林麓間」。裡面的曲房密室，都儲侍美人。而且一室之中，精思巧構，宛轉曲折，環繞盤旋，人在其中，不能一下子就走得出來，十分像迷樓。這個別墅，在文人士紳生活圈中十分著名。陳繼儒（1558-1639）為此撰詩稱：<sup>37</sup>

造園華麗極，反欲學村莊。編戶留柴葉，磊壇帶石霜。  
梅根常塞路，溪水直穿房。覓主無從入，裴回走曲廊。  
主人無俗態，築圃見文心。竹暗常疑雨，松焚自帶琴。  
牢騷寄聲伎，經濟儲山林。久已無常主，包莊說到今。

再如，在嘉定縣城著名的孔廟之外，隔橫瀝相望，是一個匯龍潭公園。該園因明代萬曆十六年（1588）開鑿的匯龍潭而得名。過去，潭的四周有新渠、野奴涇、唐家浜、南楊樹浜、北楊樹浜5條溪流，匯聚於天順四年（1460）所築的應奎山下，素有彈龍取珠之象，現在仍有遺跡可尋。根據民國地方志編撰者的紀錄，那時匯龍潭湖面十分寬暢，中有應奎山，樹木叢茂，風景甚佳。遇端陽節，就在這裡舉行龍舟比賽。清末時，在這裡同時舉行比賽的有六、七艘龍舟，有青烏、綠白、百子、老黃龍等名稱；比賽的日程也往往依據龍舟的多少來確定。每天龍舟遍遊四門，晚上也有全身燃燈的龍舟，稱為「夜式」。相傳在太平天國戰爭前，這種「夜式」多達數倍，可以想見當時的盛況。每逢立夏節，賽舟人先用一個竹竿插在柱上，然後焚燒香燭、錠帛，這叫作「立咒」，如同宣誓要做某事一樣。比賽開始時，再由好事者抓鬮以排定先後次序。獲得第一的，當然以此為榮，作為

<sup>37</sup>（明）張岱：《西湖夢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2，「青蓮山房」條，頁30。

領頭，輪流競賽，每年都是這樣。每當比賽舉行的時候，蘇州畫舫（俗稱燈船）大多到這裡來營業，一些富商豪客都來遊玩，各地賣藝的也聚集在這裡。大概要過十天，比賽才會結束。<sup>38</sup> 但是，現在的匯龍潭只是人們閒步的地方，往日盛況自然沒有了。<sup>39</sup>

支撐江南社會發展的環境基礎，當然是頗為密集的河湖水網系統。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認為，地文結構對於形成地域經濟和地區社會體系，具有超過一切的重要性；這類體系，首先是在一個較小的地文區劃（較短的河流或支流流域）內發展，然後，這種獨立體系又與別的獨立體系發生聯繫，從而形成較大的體系。<sup>40</sup> 就江南地區而言，其核心當然是太湖水系平原，而構成該流域單元的各類河流所形成的次級地域體系，則多而複雜。

河湖水網這些本屬自然存在形體的東西，與人文社會一直發生著極其密切的各種聯繫，是江南城鄉民眾生活的基本依賴。尤其對江南城鎮聚落而言，水文環境的塑造顯得十分重大。其街道都依河而設，建築臨河而造，橋樑相當密集，充分體現了小橋、流水、人家的水鄉特色。舟船在其間就成了溝通的重要媒介。<sup>41</sup>

其中，畫舫樓船是江南士人在水鄉澤國中享受曼妙生活的絕佳憑藉。嘉興的姚北若（生卒年不詳），曾將十二艘樓船放於秦淮河中，招集四方來南京貢院參加科考的知名之士百餘人，每艘船中都邀有名妓四人陪酒；再加梨園一部，燈火笙歌，成爲一時之盛事。此前，常熟籍庠生沈雨若（生卒年不詳），在嘉興曾費千金徵歌選妓，根據花之貴賤，定出妓之妍媸，並出榜遊街，設筵慶賀，亦爲江南人所豔

<sup>38</sup> 陳傳德修，黃世祚纂：民國《嘉定縣續志》（民國19年鉛印本），收於《中國地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華中地方第170號，卷5，〈風俗〉，頁12b-13a。

<sup>39</sup> 馮賢亮：〈嘉定古城攬勝〉，《地理知識》1997年第9期，頁27-28。

<sup>40</sup> [美]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頁13-14。

<sup>41</sup> 參見馮賢亮：〈舟船交通：明清太湖平原的環境與人生〉，《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5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頁341-374。

稱。<sup>42</sup>

清代初期余懷的休閒娛樂活動，行船從鎮江下東南，在蘇州、松江、昆山等地逗留了很久，其全部日常生活基本上就在船上渡過。<sup>43</sup>

就江南地區的逸樂選擇與生活追求而言，蘇州顯然是時人的主要目標。<sup>44</sup>張岱曾感嘆道：「吾浙人極無主見，蘇人所尚，極力摹仿。」<sup>45</sup>還有人說：「蘇垣築自吳王闔閭，閱時千百載，城郭依舊，然丘陵猶昔。湖山之勝，風物之美，既甲於吳，亦軼於浙。用是每逢春秋佳日，山塘七里，遊人如織；而四方人士之來游天平、穹窿、靈岩諸勝者，尋幽探奇，踵趾相接。」<sup>46</sup>蘇州地方呈現出的各種「奢侈之風」，在明清鼎革後，似乎「益見僭踰，等威無辨，貴賤不分」了。不僅倡優輩盛其服飾，即商賈工作者們皆著綺紵，而「食必羅列豐腆，窮極水陸」，<sup>47</sup>景象令人慨歎。

### 三、閶門外山塘

作為明清時期江南地區最為繁華壯闊的城市，歷史悠久的蘇州城，枕江倚湖，「食海山之饒，擁土膏之利」，呈現出一派民殷物繁的景象。有人認為，「吳郡之於天下，如家之有府庫、人之有胸腹也。」<sup>48</sup>

<sup>42</sup>（清）余懷：《板橋雜記》，卷下，〈軼事〉，頁54-55。

<sup>43</sup>（清）余懷：《三吳遊覽志》，附於氏著：《板橋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83-136。

<sup>44</sup>（明）王士性：《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2，〈兩都〉，頁33。

<sup>45</sup>（明）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卷3，〈書牘·又與毅儒八弟〉，頁142。

<sup>46</sup>陸璣卿、顏大圭：《旅蘇必讀》（蘇州：吳縣市鄉公報社1922年刊本），首集，李伯蓮〈序〉，頁1。

<sup>47</sup>（清）陸文衡：《菴庵隨筆》（臺北：臺灣廣文書局，1969年，光緒二十三年吳江陸同壽刻本），卷4，〈風俗〉。

<sup>48</sup>（清）李銘皖、譚鈞培修，（清）馮桂芬等纂：同治《蘇州府志》（同治間

世代務農的蘇州府長洲縣相城人王錡（1433-1499）指出，成化年間以來的蘇州城，已極形富麗之態：<sup>49</sup>

愈益繁盛，閭簷輻輳，萬瓦甃鱗，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從蓋，壺觴罍盒，交馳於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遊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於於綠波朱閣之間，絲竹謳舞與市聲相雜。凡上供錦綺、文具、花果、珍羞奇異之物，歲有所增，若刻絲累漆之屬，自浙宋以來，其藝久廢，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產益多。至於人材輩出，尤為冠絕。

生活時代較王氏稍晚的吳縣人黃省曾（1490-1540），亦有類似的描畫：<sup>50</sup>

今吳中士夫畫船遊泛，攜妓登山，而虎丘則以太守胡纘宗創造台閣數重，增益勝眺。自是，四時遊客無寥寂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雲。而它所則春初西山踏青，夏則泛觀荷蕩，秋則桂嶺，九月登高，鼓吹沸川以往。

萬曆十年（1582），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來到長江下游，稱其眼中的蘇州「是這個地區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以它的繁華富饒，以它的人口眾多和以使一個城市變得壯麗所需的一切事物而聞名。它位於一條平靜的清水河上，或者可以更恰當地說是位於一個湖上，吹拂著和風。」<sup>51</sup> 在後來海外學者的視野中，更確信它

修、光緒九年江蘇書局刊本），卷2，〈疆域·形勢〉，頁19a-19b。

<sup>49</sup>（明）王錡：《寓圃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5，「吳中近年之盛」條，頁42。

<sup>50</sup>（明）黃省曾：《吳風錄》（明隆慶刻萬曆增修百陵學山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年影印本），頁1a。

<sup>51</sup>〔義〕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法〕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38。

是唯一巨大的前現代化城市，是它資助了政府而不是相反。<sup>52</sup>

不過，經歷明清王朝之更替，蘇州雖無揚州、江陰、嘉定、崑山等城市那樣的兵燹之災，但仍受到不少影響。順治十年（1653）閏六月，海甯人談遷來到蘇州，看到過去十分繁華的蘇州葑門、盤門、胥門三個地方，「多丘墟瓦礫」；而在閶門，繁麗仍「不減於昔」。在這裡，他有了「閱書肆」的機會，居然買到四十餘部書。這已是十分難得，因為在當時，除蘇州、杭州、南京外，已極少有書肆了。數日後，當地適逢賽「司疫之神」，「士女駢舟如溱洧」，所賽多為「角觥之戲」。<sup>53</sup> 而在閶門外下塘，原本世家聚居的宏大宅第，因戰亂而被焚毀，有「曠野」子遺之感。<sup>54</sup> 這些都是明清易代兵燹後，江南繁華城市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到康熙下江南時，看到這個久負盛名的全國財賦重地後，認為「市鎮通衢似覺充盈，其鄉寧之饒、人情之樸，不及北方，皆因粉飾奢華所致」，<sup>55</sup> 顯然，蘇州地區已經恢復和發展起來了。清初吳江紳士陸文衡（生卒年不詳）認為：「風俗奢靡，莫如蘇郡。」<sup>56</sup> 類似的評述，還有不少。如崑山人歸莊（1613-1673）論道：「今日吳風汰侈已甚。數里之城，園圃相望，膏腴之壤，變為丘壑，繡戶雕甍，叢花茂樹，恣一時遊觀之樂，不恤其他。」<sup>57</sup> 在時人

<sup>52</sup> [美]邁克爾·馬默（Michael Marme）：〈人間天堂：蘇州的崛起，1127-1550〉，收於[美]林達·詹森（Linda Cooke Johnson）主編，成一農譯：《帝國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59。

<sup>53</sup>（清）談遷：《北遊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紀程」，頁3-4。

<sup>54</sup>（明）徐樹丕：《識小錄》，卷4，「紫芝園」條，稿本，收於孫毓修編：《涵芬樓秘笈》（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集，頁932。徐氏是明末蘇州諸生，卒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

<sup>55</sup>（明）徐樹丕：《識小錄》，卷4，「紫芝園」條，稿本，收於孫毓修編：《涵芬樓秘笈》（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集，頁932。徐氏是明末蘇州諸生，卒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

<sup>56</sup>（清）陸文衡：《菴庵隨筆》（臺北：臺灣廣文書局，1969年，光緒二十三年吳江陸同壽刻本），卷4，〈風俗〉。

<sup>57</sup>（清）歸莊：《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6，〈記·太倉顧氏宅記〉，頁351。

這類奢華太過的評判背後，映射出蘇州地方生活中應該存在的安逸之態，而這種感覺又具有鮮明的時代性。

自北方遊歷江南的孫嘉淦（1683-1753）認為，距離虎丘南六七里的蘇州城「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特別是其閭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燦若雲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sup>58</sup> 這種城市繁華的感覺，對外來的人們有著更強的衝擊力。所以到乾隆時代，蘇州依然使外國人感覺大好的原因，就是這種繁華安逸的外在景象。由於被眾多的河流包圍，大運河邊的蘇州讓外國人覺得十分像義大利的水上名城威尼斯。有人這樣記載道：

蘇州府是一個面積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的城。城內房子大部分建築和裝飾得很好。這裡人民大多數穿絲質衣服，樣子顯得非常愉快。整個城市呈現出一片繁榮氣象。據說這裡人對把首都遷至北京至今還有意見：過去距離蘇州府很近的南京是全國首都。中國的統治者把首都由這塊無論從哪方面講都是得天獨厚並又經過巧妙加工改良的地方遷到韃靼區邊沿的北直隸，完全是從強烈的政治角度考慮決定的。蘇州府一向被認為是中國的天堂。當地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叫做「上有天堂，下有蘇州府」。<sup>59</sup>

在這裡，各類休閒娛樂一直十分繁盛。以專為迎神活動而備的表演而言，就包括了傀儡、竿木、刀門、戲馬、馬上橈、走索、弄繖、廣東獅子等遊藝。<sup>60</sup> 因而就此角度而言，蘇州當然也是一個綜合性的

---

<sup>58</sup>（清）孫嘉淦：《南遊記》（一卷），收於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編：《山右叢書初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據民國年間刊本影印版），第9冊，頁6a。

<sup>59</sup>〔英〕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上海：上海書店，2005年），頁431。

<sup>60</sup>（明）王弼登：《訂正吳社編》（明刻本），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1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影印版），1卷，頁8a。

休閒娛樂中心，是文人紳士們嚮往的生活空間。

這樣的空間，在蘇州城內外可以被區分成很多單元。例如，蘇州的一個重要城門葑門，風光相當引人。以這個城門為中心的生活區，已讓文人們感覺大好。天啟二年（1622）六月二十日，天氣正當炎熱之際，張岱來到了蘇州，看到士女傾城而出，都湧到了葑門外的荷花宕。這一帶本是水鄉，樓船、畫舫以至魚船小艇，早已被雇覓一空。有的外來遊客，身帶數萬錢，也找不到一隻船，僅能在岸上遊蕩。張岱來時正好坐著船，可以看到這個荷花宕的一些美妙景象：「宕中以大船為經，小船為緯，遊冶子弟，輕舟鼓吹，往來如梭。舟中麗人皆倩妝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紗。」張岱感嘆道：「舟楫之勝以擠，鼓吹之勝以集，男女之勝以溷」，在酷暑時節，這樣的狀態實在令人沸騰。<sup>61</sup> 後來這種觀荷風氣，多有至虎丘山浜者。<sup>62</sup>

比較而言，城中最熱鬧的地方，要數西北門「破楚門」（習稱「閶門」）所形成的生活區，曹雪芹言其「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sup>63</sup> 而閶門外的七里山塘，已屬城外的鄉野之地，但這個一河兩岸為主體的生活區，「煙戶千家，酒樓花市，民居稠密，一葦可杭，遊者便之」，<sup>64</sup> 在感覺上，似乎超邁了城內的逸樂生活。

一般認為，閶門外在蘇州地方史上長期屬於商貿繁華之地，商店林立，貨物充足，<sup>65</sup> 曾被喻為「天下第一碼頭」。外地商人大量盤踞於此，商業「客幫」林立，主要有鮮幫、京莊、山東、河南、山西、湖

<sup>61</sup>（明）張岱：《陶庵夢憶》，卷1，「葑門荷宕」條，頁6。

<sup>62</sup>（清）顧祿：《清嘉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6，〈六月〉，「荷花蕩」條，頁142。

<sup>63</sup>（清）曹雪芹、高鶚：《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1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頁7。

<sup>64</sup>（清）袁學瀾：〈遊虎丘山記〉，收於王稼句編：《蘇州山水名勝歷代文鈔》（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頁381。

<sup>65</sup>陳學文：〈蘇州的商業〉，《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57。

南、太谷、西安、溫臺州幫、長江幫等十餘個。<sup>66</sup> 到清末民初，閶門外的商市還有「三路一街」之說，主要即指大馬路、橫馬路、石路和上塘街這些重要的市街。到抗戰前，閶門內外的百貨、綢布、旅館、菜館、茶館、行棧、劇裝戲具、銀樓、錢莊等業仍十分繁盛。據估計，這裡共有公所30個、會館26個。<sup>67</sup> 會館、公所主要是用於同鄉客商聚會、祭祀以及相互扶助、貨物存放、資訊交流的地方。<sup>68</sup> 蘇州的眾多會館，有其比較獨立的發展源流。<sup>69</sup>

在山塘街上曾有的眾多會館，是蘇州城市商業繁盛的體現。在顧祿的記憶中，虎丘山塘的會館主要有岡州會館（康熙十七年建，在寶安會館東）、仙城會館（在山塘橋西）、寶安會館（康熙十六年建，在嶺南會館東）、嶺南會館（萬曆年間建，在山塘橋西）、雍涼會館（即全秦會館，俗稱陝西會館，乾隆六年建，在毛家橋西）、東齊會館（在半塘，天啟年間建）、全晉會館（在半塘橋，乾隆三十年建）、翼城會館（在小武當山西，俗稱老山西會館）、鎮江公所（在小武當，乾隆年間建）、磨坊公所（在小武當，乾隆年間建）、毗陵會館（在蓮花兜，乾隆二十七年建）。<sup>70</sup>

到民國時期，據官方編撰的方志記載，蘇州維持下來的商業組織，很多仍舊位於閶門外、虎丘山塘一帶，並且全部被納入了「公

<sup>66</sup>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84-185。

<sup>67</sup> 金閶區志編纂委員會編：《金閶區志》（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26、236。

<sup>68</sup> 參見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年）；呂作燮：《論明清時期會館的性質和作用》，收於南京大學明清史研究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72-211、〈明清時期蘇州的會館和公所〉，《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年第2期，頁10-24；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1990年）；王日根：《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

<sup>69</sup> 王衛平：《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為中心》，（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78-80、186。

<sup>70</sup> （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6，〈會館〉，頁88-89。

署」體系，但其創始也多在清代，與顧祿的統計相仿。主要如下：

- 浙右公所，在南濠；
- 農務總會，在閶門外楓，清宣統二年夏五月陶惟坻、倪開鼎等奉文創設；
- 嶺南會館，在虎丘山塘橋西，明萬曆間廣州商人創建，清康熙五年重建；
- 寶安會館，在嶺南館東，清康熙十六年東莞商人建；
- 岡州會館，在寶安館東，清康熙十七年義甯商人建；
- 全秦會館，在山塘毛家橋西，清乾隆六年西安商人鄧廷試、劉輝揚倡建；
- 東齊會館，在全秦館西，清順治間山東膠州、青州、登州商人建；
- 全晉會館，在虎丘半塘橋，清乾隆三十年山西商人建；
- 廣東會館，在閶門外李繼宗巷口；
- 金華會館，在南濠大街；
- 浙寧會館，同上；
- 震澤會館，同上；
- 三山會館，同上；
- 汀州會館，在閶門外上津橋，清康熙五十七年福建上杭縣六串紙幫建，咸豐庚申毀，光緒丁亥秋重行修復。<sup>71</sup>

上述有限的史料，可以反映出虎丘山塘經濟活躍的程度與商業網絡布織的情況。倘若按照乾隆時期地方文人的觀點，蘇州重要的商業貿易之中轉或匯聚中心，可以區分成三個，即閶門外西北境二十五里的澹墅（處南北運河要衝，設有戶部鈔關）、楓橋與虎丘山塘，都是時人感覺中最著名的「商賈駢集、物貨輻輳之地」。<sup>72</sup>而閶門外的虎

<sup>71</sup>（清）吳秀之等修，（清）曹允源等纂：光緒《吳縣志》，卷30，〈公署三〉，頁4b-7a。

<sup>72</sup>（清）沈德潛、顧詒祿纂，（清）許治修：乾隆《元和縣志》（乾隆二十六

丘山塘一帶，已然成爲全國性商貿活動的聚集區，且獨具獨色。<sup>73</sup>

所以，隨著商業的發展、手工業的興盛、居民（包括移民）人數的增加，閶門外的景況已遠非一般的鄉野之地，「已經變成府城的一個延伸部分」。像原來作爲棉布加工業的主體逐漸移往城外後，到清代雍正年間，輔助的踹染業主體也移到了閶門外的上、下塘。<sup>74</sup>而染坊在虎丘山塘一帶的長期經營，必然會使河流發生污染，引起其他居民的強烈不滿。早在乾隆二年（1737）官府刻立的〈蘇州府永禁虎丘開設染坊污染河道碑〉中，就指出了蘇州等地在這方面問題的嚴重性。官府特別強調在風景名勝區虎丘地段染坊流出的污水，對附近農田禾苗、花園勝景的損害；那些「青紅黑紫」的污水，已嚴重危及居民的日常生活，要求染坊遷移他處開張。<sup>75</sup>

#### 四、人文地景的豐富與擴張

在日常生活中，不同地區的人們爲了滿足其物質、精神等方面的需求，會於自然環境的基礎上，疊加出極富文化特質與生活趣味的景觀，像各類名勝古跡、建築群落、河流交通與橋樑配搭、節俗安排與相關活動等等，在具有很強的歷史感的同時，也有其文化娛樂的吸引力。

虎丘山塘的人文地景，在整個江南地區特別是蘇州城市發展變化的背景條件下，至清代已有了豐富及擴張。如果僅從傳世文獻的角度

---

年刻本），卷9，〈兵防〉，收於《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誌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版），第14冊，頁4b。

<sup>73</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凡例〉，頁2。

<sup>74</sup>李伯重：《工業發展與城市變化：明中葉至清中葉的蘇州》，收於李伯重、周生春主編：《江南的城市工業與地方文化（960-1850）》（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8、55。

<sup>75</sup>乾隆二年〈蘇州府永禁虎丘開設染坊污染河道碑〉，收於蘇州博物館、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南京大學明清史研究室合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71-73。

來考察，這種變化是可以通過地方志記述之差異，得到大概認識的。洪武、<sup>76</sup>正德、<sup>77</sup>隆慶、<sup>78</sup>萬曆、<sup>79</sup>崇禎、<sup>80</sup>乾隆、<sup>81</sup>同治、<sup>82</sup>光緒<sup>83</sup>等時期的相關府縣志，對山塘之記述及風光的描摹，呈現了前略後詳的態勢，並且後來的文人在記述過程中，會不斷往前追述或疊加。詩詞歌賦、散文遊記與風俗故事等，是其最多的表現方式，從而呈現出不同時代人們對於美好事物和生活的共同體認，構建出山塘生活空間兼具的地方感，以及其中應當存在的與其他地域的區分意識。乾隆年間永嘉人周鳳岐（1879-1938）指出，在蘇州地區，「虎丘岩石之奇，丘壑之邃，殿宇之雄麗，林木之蔥蔚，紳士遊宴之所必集，南北往來之所必經」。<sup>84</sup>山水、丘壑、寺觀、祠宇、水陸交通、宴遊生活等這些已然固化的景觀物事，都使虎丘山塘文化與生活的內容更臻豐滿，從而形塑了人們對蘇州山塘「終古繁華閱綺羅，山溫水軟豔情多」的基本觀念或感覺。<sup>85</sup>

<sup>76</sup>（明）盧熊：《蘇州府志》（洪武十二年抄本），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432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版）。

<sup>77</sup>（明）林世遠修，（明）王鏊纂：正德《姑蘇志》（正德間刻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影印版）。

<sup>78</sup>（明）張德夫修，（明）皇甫廙等撰：隆慶《長洲縣志》（隆慶五年刻本），收於《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影印版），第23冊。

<sup>79</sup>（明）皇甫汈等編：萬曆《長洲縣志》（萬曆間修、崇禎八年刊本），收於《中國史學叢書三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影印本），第4輯。

<sup>80</sup>（明）牛若麟、王煥如纂修：崇禎《吳縣志》（明崇禎間刻本）。

<sup>81</sup>（清）李光祚修，（清）顧詒祿等纂：乾隆《長洲縣志》（乾隆十八年刻本），收於《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版），第13冊；（清）沈德潛、顧詒祿纂，（清）許治修：乾隆《元和縣志》（乾隆二十六年刻本），收於《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版），第14冊。

<sup>82</sup>（清）李銘皖、譚鈞培修，（清）馮桂芬等纂：同治《蘇州府志》（同治間修、光緒九年江蘇書局刊本）。

<sup>83</sup>（清）吳秀之等修，（清）曹允源等纂：光緒《吳縣志》。

<sup>84</sup>（清）陸肇域、任兆麟編纂：《虎阜志》（蘇州：古吳軒出版社，1995年），卷10，〈雜記〉，頁593。

<sup>85</sup>（清）姚承緒：《吳趨訪古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1，

首先看休閒、娛樂生活方面的表現。

除前文述及的閭門外，虎丘是七里山塘的兩端之一。其中，虎丘山是當地最著名的古跡，此外還有劍池、陸羽石井、放生池、點頭石、試劍石等。而能與劍池並稱的是千人坐，又稱千人石。明末清初文社如林、各標名目的人文環境中，「復社」生童五百人就曾聚於千人石上會課，敦請東南文壇領袖之一、太倉人吳偉業（1609-1672）執牛耳，一時被世人慕為雅事。<sup>86</sup>而常熟名士陳祖範（1676-1754）的一首小詩，則點出了這一帶娛樂生活的另一種面向：「千人石上沸笙歌，七里山塘粉黛多。看得羅敷歸怨怒，明朝出意畫雙娥。」<sup>87</sup>

在虎丘的二山門內，蘇州府的附郭長洲、元和、吳縣共同祭有一個厲壇，全部用石頭堆就，縱橫各有三丈，高四丈；每年的清明、七月望、十月朔，是城隍神出巡的日期，儀仗隊會將神像抬到這裡，宣讀祭文，祭祀蘇州府地區的無祀鬼神。活動由知府主持，上述三縣令陪祀。<sup>88</sup>在清初人看來，正是這類官府宣導的神靈信仰活動，促進了虎丘山塘景觀的豐富化，而且也只有在這些時節，「山塘一帶觀者如雲，鼓樂幡幢盈塞道路」，很多婦女甚至在山塘「賃屋而觀」，與晚明相較，明清鼎革後更顯繁盛，「山塘至虎丘，無一寸隙地」。<sup>89</sup>

因而，這些表面上屬於純粹的官方娛神行爲，實際也已成爲民眾實際上的娛樂時節。光緒、民國時期蘇州地方志的編撰者們，詳細總結了虎丘山塘的重要節期及娛樂形式：一是農曆三月清明節時，「府縣詣虎邱厲壇，祭無祀孤魂、府縣城隍神及十鄉土穀諸神，以

---

〈蘇州〉，「姑蘇懷古」條，頁1。

<sup>86</sup>（清）顧公燮：《丹午筆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吳梅村被嘲」條，頁56-57。

<sup>87</sup>（清）陳祖範：《司業詩集》（乾隆二十九年刻本），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影印版），集部第274冊，卷1，〈東吳棹歌〉，頁15a。

<sup>88</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4，〈祠宇〉，頁57。

<sup>89</sup>（明）徐樹丕：《識小錄》，卷4，「吳中巫風」條，稿本，收於孫毓修編：《涵芬樓秘笈》（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集，頁947。

次臨壇，主祭、陪祭，巡撫都土地諸神，督祭各境，均舁其神像至壇，謂之『舍會』。每會至壇，簫鼓悠揚，旌旗璀璨，鹵簿臺閣，鬪麗爭妍。七里山塘，遊人駢集，曰『看會』。<sup>90</sup>在「舍會」、「看會」之後，傍晚時分，人們再將神像抬回廟中，則稱「轉壇會」。虎丘山塘的重大娛樂「節序」，也可以說是從這個清明節開始的。沈朝初的〈憶江南〉詞這樣寫道：「蘇州好，節序屆清明。郡廟旌旗壇裡盛，十鄉臺閣半塘迎。看會遍蘇城。」<sup>91</sup>這種「十鄉臺閣半塘迎」的景況，朱彝尊（1629-1709）曾以詩歌的方式描述過：「寒食山塘路，遊人隊隊偕。桁楊充臯隸，簫鼓導神牌。紅粉齊當牖，銀花有墮釵。殷勤短主簿，端笏立階階。神來官道擁，祝祭厲壇仍。活脫青袍引，縱橫繡纓乘。巫風書具訓，奢俗禮宜懲。手版紛紛集，吾憐張季鷹。」<sup>92</sup>二是七月望，是人們熟知的中元節，遊人大多集於山塘，觀看「無祀鬼會」。<sup>93</sup>三是十月朔，為下元節，主要活動都與清明節相仿。在這樣的節期裡，山塘出現了「遊俠貴介，妖姬豔妓，駕畫舫，臨彩鷁，徜徉於斟酌橋一帶，如魚尾之相接」之盛景，俗稱「打招」。蘇州各園林都會在清明節開放，至立夏日而止，僅納錢少許而縱人遊覽。<sup>94</sup>此三節期間，「畫船鱗集山塘」，較端午節的龍舟競渡還要興盛。<sup>95</sup>如果說，這些活動都屬鬼節的話，那麼其他節期出現於七里山塘的娛樂活動，堪稱狂歡了。

清中期人褚逢椿（生卒年不詳）指出，虎丘山塘一帶作為商賈輻

<sup>90</sup>（清）吳秀之等修，（清）曹允源等纂：光緒《吳縣志》，卷52上，〈風俗一〉，頁13b。

<sup>91</sup>（清）顧祿：《清嘉錄》，卷3，〈三月〉，「山塘看會」條，頁66-67。

<sup>92</sup>（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光緒十五年刊寒梅館藏版，馮賢亮藏本），卷21，〈古今詩·山塘紀事二首〉，頁15b。

<sup>93</sup>（清）顧祿：《清嘉錄》，卷7，〈七月〉，「七月半」條，頁155。

<sup>94</sup>（清）吳秀之等修，（清）曹允源等纂：光緒《吳縣志》，卷52上，〈風俗一〉，頁14a。

<sup>95</sup>（清）簡中生：《吳門畫舫續錄》，「紀事」，收於王稼句編：《蘇州文獻叢鈔初編》（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年），頁794。

輾之地，「列肆鱗比」，且「青翰往來，殆無虛日」；以往遊跡盛於中秋，到這時就以端午前後數日為盛了，其娛樂活動令人瞠目：「畫舫珠簾，人雲汗雨，填流塞渠」，其間「紈袴子又復征歌選妓於其間，郡中士女傾城而往」。這顯然給娛樂業帶來更多的利益，即使是長年在此以划船為生的，也因此「值增累倍」。人們在這段時期裡一日的消費，往往達中人數家之產，可謂奢靡。<sup>96</sup>

不過，在王韜（1828-1897）的構畫中，山塘的中秋節依然繁盛：「時屆中秋節，七里山塘遊人蟻集，畫舫雲屯，笙歌雷沸，兩岸殆無少隙。」<sup>97</sup>本來，中秋就是普通民眾與士紳們同慶的重要時節。虎丘山塘在此節期的繁盛之狀，僑居嘉定的歙縣人李流芳（1575-1629）很早就有深刻的感受：

虎丘，中秋游者尤盛。士女傾城而往，笙歌笑語，填山沸林，終夜不絕，遂使丘壑化為酒場，穢雜可恨。予初十日到郡，連夜遊虎丘，月色甚美，遊人尚稀，風亭月榭間，以紅粉笙歌一兩隊點綴，亦復不惡。<sup>98</sup>

此後，張岱在清初的追憶中，更有極精彩的記述：

土著流寓、士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名妓戲婆、民間少婦好女、崽子孌童及遊冶惡少、清客幫閒、僮僕走空之輩，無不鱗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鶴澗、劍池、申文定祠，下至試劍石、一二山門，皆鋪氈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處，大吹大擂，十番鏡鼓，漁陽摻撾，動地翻天，雷轟鼎沸，呼叫不聞。更定，鼓鏡漸歇，絲管

<sup>96</sup>（清）褚逢椿：《桐橋倚棹錄》序，載（清）顧祿：《桐橋倚棹錄》，頁1。

<sup>97</sup>（清）王韜：《淞濱瑣話》（上海：新文化書社，1934年），卷4，「皇甫更生」條，頁71。

<sup>98</sup>（明）李流芳：《檀園集》，卷8，〈記疏·游虎邱小記〉，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5冊，集部234，頁6a。

繁興，雜以歌唱，皆「錦帆開澄湖萬頃」同場大麵，蹲踏和鑼絲竹肉聲，不辨拍煞。更深，人漸散去，士夫眷屬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獻技，南北雜之，管弦迭奏，聽者方辨句字，藻鑿隨之。二鼓人靜，悉屏管弦，洞簫一縷，哀澀清綿與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為之。三鼓，月孤氣肅，人皆寂闕，不雜蚊虻，一夫登場，高坐石上，不簫不拍，聲出如絲，裂石穿雲，串度抑揚，一字一刻，聽者尋入針芥，心血為枯，不敢擊節，惟有點頭。然此時雁比而坐者，猶存百十人焉。使非蘇州，焉討識者。<sup>99</sup>

蔡雲（？-1662）的〈吳猷〉也有類似的描述：「七里山塘七里船，船船笙笛夜喧天。十千那夠一船費，月未上弦直到圓。」<sup>100</sup>

山塘的全盛時期，在每年重大的集會節慶活動時，即元宵燈節、清明節、端午節、六月二十四日的「荷花生日」、中元節、中秋節、十月朝等，「燈船如雲」。而燈船全都是蘇州人所有的「淌板船」，船主多張、沈二姓。燈船停泊之處，即其居所在，「臨流小築，位置天然，不啻秦淮水榭」，又營造出山塘「特佳」的風景。<sup>101</sup>

至於蘇州地方的龍舟競渡，仍以山塘為勝，似乎所有的蘇州城士女都會到這裡來，就像元和縣人袁學瀾（1804-1879）所說的「傾城士女鬥新妝，投黍江心酌淥觴」。<sup>102</sup> 對此，時人還有更細的刻畫：

土人於月杪，即起龍舟開演，畫舫簫鼓，已陸續聚於冶芳淥水間矣。至端陽前後十餘日，觀者傾城，萬船雲集，遠郡士女，結伴紛來，鬢影衣香，霧迷七里。百工廢業，小戶傾家，甚至雷雨不能阻，父兄不能禁。<sup>103</sup>

<sup>99</sup>（明）張岱：《陶庵夢憶》，卷5，「虎丘中秋夜」條，頁46-47。

<sup>100</sup>（清）顧祿：《清嘉錄》，卷8，〈八月〉，「走月亮」條，頁165。

<sup>101</sup>（清）陳去病：《五石脂》（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353-354。

<sup>102</sup>（清）陳去病：《五石脂》，頁353-354。

<sup>103</sup>（清）箇中生：《吳門畫舫續錄》，「紀事」，收於王稼句編：《蘇州文獻叢鈔

虎丘山塘如此繁華的節日生活，聚合了社會各個階層人們的熱情參與，但若不是在蘇州，可能不會出現這樣的盛景，所以更讓外鄉人豔羨不已。

至於平常時節，虎丘山塘的閒適與美好，也常常見諸不同時期文人的筆端。譬如，清初著名文士余懷，長期僑居南京，生性好遊，行爲放蕩不羈；家居不樂時，就駕車乘舟出遊至蘇州等地。他在順治七年（1650）寫的《三吳遊覽志》，「凡江山花鳥、洞壑煙雲、畫舫朱樓、綺琴錦瑟、美人名士、麗客高僧，以及荒榭遺台、殘碑寒驛」，都囊括其中，<sup>104</sup> 令人感覺美好。這種閒遊所帶來的身心之愉悅，自非一般人所能輕易獲得。例如，該年四月十一日，天氣晴朗，余懷重遊蘇州半塘，見舟中多麗人；余懷棄舟登岸，回來時，將採擇的花插入膽瓶，使馨香之氣溢滿幾案間。次日天氣更暖，余懷來到昆山，在船上偶遇一女郎，「鬢髮如綠雲，美姿容，衣羅綻，弄手腕蕩漿，翩若驚鴻」。後杳不知去處，給余懷留下了美好的遺憾，所謂「可恨亦可憐也」。<sup>105</sup> 像余懷這樣的偶遇和美好回憶，在蘇州地區應該是最容易發生的。

其次是舟船交通的綿密與生活的便利。

水鄉地區這些生活逸樂的建構，十分依賴河道水運的暢通、舟船的便利以及橋樑的布織，並使城鄉的各種聯繫變得緊密起來，也成爲人們對「水鄉澤國」觀念形成的一個構因。

在乾隆年間徐揚所繪的〈姑蘇繁華圖〉（又稱〈盛世滋生圖〉）中，重點描繪了一城、一村、一鎮、一街，對蘇州城市形象與地景作了生動的形塑。<sup>106</sup> 其中的一街就是山塘街。如果仔細觀察，還能看到三家船行，其中兩家設在貨物集中地棗市街，一家在閘門，主要爲

---

初編》，頁792。

<sup>104</sup>（清）余懷：《三吳遊覽志》，附於氏著：《板橋雜記》，頁83。

<sup>105</sup>（清）余懷：《三吳遊覽志》，頁90。

<sup>106</sup> 參見王正華：〈乾隆朝蘇州城市圖像：政治權力、文化消費與地景塑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2005年12月），頁115-184。

商家承攬運輸工作，<sup>107</sup> 應該都是當時在蘇州比較重要而信譽良好的船行。但從日常生活所需的交通網絡來看，則格局完備而成熟。江南區域內的舟船行程，將綿密的城鄉交通網點，精心地編織起來。例如，蘇州由湖州至孝豐縣的水路驛程，就堪為代表：蘇州閶門新開河搭湖州夜航船，每人輿銀2分，沿京杭運河南下50里至吳江縣，40里至平望，12里至梅堰，24里至震澤，12里至南潯，換船，每人輿銀8厘，12里至東遷，15里至舊館，18里至升山，西行8里至湖州府。從湖州府西門外搭夜航船，每人輿銀1分，西行9里至楊家莊，9里至嚴家墳，由此西北沿泗安塘往四安，自嚴家墳沿西苕溪西南行45里至吳山灣，9里到小溪口，9里至安吉縣金灣（荊灣），9里至梅溪，30里至安吉州，40里至孝豐縣。<sup>108</sup> 類似這樣以蘇州為起點的商路，在明代人統計的全國水陸行程100條路線中，就佔了6條。<sup>109</sup> 成書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清代旅程書《天下路程示我周行》中的〈從蘇州府經雙塔至松江府的水路〉，呈現了江南大運河從鎮江到杭州中的重要一段，即蘇州閶門到松江的水路幹線，共計長153里，途中有需要停靠的13個泊船碼頭：新工河塔、雙塔、盤門、葑門、黃天錫、獨樹湖、高店、大八間村、大窯、陳湖、澱山湖、謝寨門巡司、柳湖，中間間隔5里到18里不等。這段行程基本上屬於傳統的驛路。至於速度，蘇州與上海間有100多公里的距離，民船需航行四、五日；這一速度，是一個常速，與順水情況下在大運河、長航行一日50里，而逆流的情況一日30里的速度，其本相符。<sup>110</sup> 這樣的水運交通線十分利於各地的人們向蘇州聚攏，而以商人的活動最顯眼。

<sup>107</sup> 范金民：〈清代蘇州城市文化繁華的寫照——〈盛世滋生圖〉〉，收於熊月之、熊秉真主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頁268-289。

<sup>108</sup> 詳參（明）程春宇：《士商類要》，卷1，收於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附錄」，頁255。

<sup>109</sup> 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頁170。

<sup>110</sup> [日]松浦章：〈清代江南內河的水運〉，《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頁35-41。

雲集於蘇州城的各地商人，爲了販運的便利，又各自建有不同的碼頭。像山西、陝西、河南等省的商人，在閘門外南濠設有較爲統一的北貨碼頭。據同治九年（1870）〈秦晉豫三省創建南濠北貨碼頭碑記〉，他們來蘇辦貨，「向從浦口行運，由來久矣。各走各路，聽其自便，而按時銷販，從無愆期。故熙來攘往，於吳會爲獨盛。」<sup>111</sup>

第三，是橋樑的分布及其中心聚合作用。<sup>112</sup>

明人所謂「城郭則民萃以居，坊巷別焉；交墟則民渙以處，鄉都辨焉」，那些廣布於城鄉地方的河港湖泊，「周邇達遐，以濟不通」，大量的橋樑因而營建。<sup>113</sup> 橋樑的聚合作用，在山塘生活世界中是十分明顯而重要的，也有如吳偉業的詩句「江村茶熟橋成市，溪館花開樹滿船」所涵括的意味。<sup>114</sup>

虎丘山塘的很多橋樑有著悠遠的歷史，至清代中期，數量已很豐富而穩定。據顧祿的統計，已達 53 座。<sup>115</sup>

而根據現存橋樑的實地觀察，山塘河上的主要古橋，橫跨的有七座：山塘橋、通貴橋、星橋、彩雲橋（半塘橋）、普濟橋、望山橋和西山廟橋。

其中，通貴橋旁是山塘人、明代前期南京吏部尚書吳一鵬的宅第。清初時，蘇州人顧公燮（生卒年不詳）曾有記載：「山塘吳文端公一鵬與菩提庵前郭方伯某友善，朝夕過從，造橋以便往來，名曰通

<sup>111</sup> 馮賢亮：《太湖平原的環境刻畫與城鄉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25。

<sup>112</sup> 對江南城鎮鄉村橋樑的社會功用與意義的宏觀說明，可參見〔日〕川勝守：《明清江南市鎮社會史研究——空間と社会形成の歴史学》，第3章，〈長江デルタにおける石造虹橋建造と市鎮の形成——交通經濟史からみた都市社会史〉（東京：汲古書院，1999年），頁190-268。

<sup>113</sup> 隆慶《長洲縣志》隆慶五年刻本，卷12，〈橋樑〉，頁26b-27a。

<sup>114</sup> （清）吳偉業：《梅村家藏稿》（華東師大圖書館藏清宣統三年董氏誦芬室刻本），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集部第1396冊，卷10詩後集2，〈七言古詩·西巘顧侍，御招同沈山人友聖虎丘夜集作圖紀勝因賦長句〉，頁8b。

<sup>115</sup> （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7，〈溪橋〉，頁96-101。

貴。」<sup>116</sup>橋在山塘橋西（閶門外西北），隆慶二年（1568）時據說橋上曾出現五色雲彩，故又名瑞雲橋。<sup>11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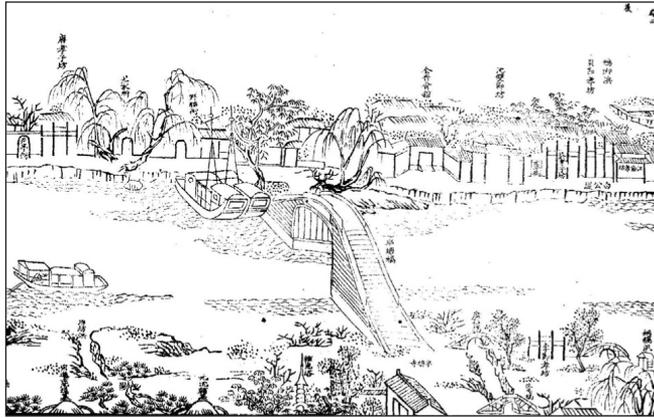
再如，彩雲橋橫跨山塘河，在半塘寺前，建於宋代政和元年（1111）。著名文人趙執信（1662-1744）曾有〈月夜過彩雲橋〉詩道：「湖山寂寞夜迢迢，霜集風中酒易消。還是秋來可憐月，照人獨上彩雲橋。」而與此橋相接、頭東尾西的則是半塘橋，閶門至虎丘有七里山塘，此橋適得其半，故名。張霽（生卒年不詳）的〈半塘橋〉詩道：「酒簾飄揚處，知是半塘橋。」說明了這裡生活的熱鬧。<sup>118</sup>此外有一首〈姑蘇城外〉詞，對橋邊民眾生活也有寫實性的描畫：「姑蘇城外有幾家，七里山塘廣種花。蕩湖船內佳人坐，虎邱山上好頑耍。郎問姐姐何方住，奴是半塘橋下是。奴家東邊栽種垂楊柳，西首一帶竹籬笆，謹防惡犬四個字，庭心有株紫荊花，郎要來時從後面進，輕輕敲門，奴在家，請進吃杯茶。」<sup>119</sup>當然，詩詞僅能反映日常生活的若干側面，而非詩詞作者們豐富多彩的生活中的全部內容。

<sup>116</sup>（清）顧公燮：《丹午筆記》，「通貴橋」條，頁183。

<sup>117</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7，〈溪橋〉，頁96。

<sup>118</sup>（清）尹繼善、趙國麟修，（清）黃之雋、章士鳳纂：乾隆《江南通志》，卷25，〈輿地志〉，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23a；（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7，〈溪橋〉，頁97-98。

<sup>119</sup>（清）華廣生：《白雪遺音》（清道光八年玉慶堂刻本），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集部第1745冊，卷3，〈南詞·姑蘇城外〉，頁150b。



圖一：半塘橋（（清）吳泰來繪：《虎丘山全圖》，載（清）顧諒祿：《虎丘山志》，收於石光明、董光和、楊光輝主編：《中華山水志叢刊》，第12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影印版，頁59。

而普濟橋，則位於半塘橋西、怡賢寺南，<sup>120</sup>因南岸接普濟堂得名。<sup>121</sup>普濟堂在康熙四十九年由（1710）蘇州府人陳明智（生卒年不詳）、顧龍（生卒年不詳）等募建，「以收養病民，供給衣食藥餌，略如京師堂制……五十五年聖祖仁皇帝賜『香岩普濟』匾額。」<sup>122</sup>

除橫跨山塘河的橋樑之外，在山塘河兩岸豎貫的古橋還有16座：白姆橋、毛家橋、勝安橋（即桐橋）、白公橋、青山橋、綠水橋、斟酌橋、萬點橋、同善橋、引善橋等等。

例如，勝安橋，也稱桐橋，據明人夏璣（1428-？）的說法，位於「蘇城西北虎丘山塘之半」，建於宋代，後來多次得到重修。李其永（1694-1781）的一首〈桐橋舟中得句〉詩，描述了這一帶的

<sup>120</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7，〈溪橋〉，頁100。

<sup>121</sup>（清）尹繼善、趙國麟修，（清）黃之雋、章士鳳纂：乾隆《江南通志》，卷25，〈輿地志〉，頁23a。

<sup>122</sup>（清）陸肇域、任兆麟編纂：《虎阜志》，卷四，〈祠祀·義舍〉，頁306。

優美風光：「橋西七十里，不斷往來波。千古峨眉女，此中載得多。三春紅燭夜，一片畫船歌。自昔成風俗，流波奈若何？」在勝安橋內，屬於兩水會合的十字洋，南面是俗稱的「桐橋圩」，屬於昔日人們競渡龍舟的主要場所，後來慢慢蛻化成為納涼避暑之區，偶而也有一二小舟停泊，在此休息。<sup>123</sup>

斟酌橋則處於山塘河、東山浜、野芳浜的交匯處，曾是畫舫雲集、名人頻顧的地方。這一帶的自然、人文風光，多見諸時人的詩歌。如，顧我樂（生卒年不詳）的詩寫道：「白公堤外水迢迢，吳女花船背櫓搖。最愛橋名是斟酌，也須春酒變春潮。」張大純（1637-1702）的〈過斟酌橋〉詩稱：「斟酌橋頭花草香，畫船載酒醉斜陽。橋邊水作鵝黃色，也逐笙歌過半塘。」<sup>124</sup>再如清人的一首〈斟酌橋〉詩：「半塘春水綠如澗，贏得橋留斟酌名。橋外水簾輕揚處，畫船簫鼓正酣聲。」<sup>125</sup>描畫的都是相似的迷人圖景。

在虎丘山寺前的萬點橋，又稱「飯店橋」，說明了其周遭環境是以飲食服務業為主的。而在普濟堂東的同善橋（又名小普濟橋，俗稱莊前浜橋），內多賣魚為生、聚族而居的婦人。在普濟堂西的，則是引善橋（即迎恩橋），俗稱打柴浜橋，是因「橋畔時有舟艇載樹枝停泊於是分肌劈理，散賣他處」而得名，也與民生相關。<sup>126</sup>

最後，是山塘的政治文化與生活記憶，也構成了山塘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並使地域景觀變得多樣。

萬曆二十九年（1601），因稅監孫隆（生卒年不詳）在蘇州等地的河港擺渡地方私設稅官，對米、鹽、果、薪、雞、豬之類普遍徵稅，引起了以織工葛成（1568-1630）（後被尊稱葛賢）為首的數千人的抗議鬥爭。最終徵稅因此而止，但葛成被捕入獄達十多年，後來遇

<sup>123</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7，〈溪橋〉，頁96-97。

<sup>124</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7，〈溪橋〉，頁98-99。

<sup>125</sup>（清）姚承緒：《吳趨訪古錄》，卷3，〈長洲（元和附）〉，「斟酌橋」條，頁62。

<sup>126</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7，〈溪橋〉，頁99-100。

赦出獄，就在五人墓傍築室而居，不久病歿，被葬於西側，文震孟（1574-1636）書「有吳葛賢之墓」碑碣，人稱「葛將軍墓」。墓記原由松江人陳繼儒（1588-1639）撰，但墓碑晚至康熙十二年（1673）刻立。<sup>127</sup> 諸暨諸生吳深（生卒年不詳）的詩：「買花棚裡弔荒塋，古碣岩崑姓氏明。七里山塘人似海，千秋祇有五人名。」<sup>128</sup> 揭示出了時人的一般遊觀感受。

發生於天啟六年（1626）蘇州市民的抗暴鬥爭，主要是反對魏闢殘害忠良，其中有5人「急於義而死」，即顏佩章（？-1626）、楊念如（？-1626）、馬傑（？-1626）、沈揚（？-1626）與周文元（？-1626）。江南士民感念其大義，「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為他們修墓勒碑於山塘街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拜且泣者」。五人墓的葬地有一畝二分，原有業戶耕種，經由官方的申請，將此地作為「義塚」，豁免了原業戶的稅糧，同時告知五人之家屬。<sup>129</sup> 乾隆年間朝廷曾下旨予以旌表，「送五人復聖祠從祀」。<sup>130</sup> 但在後人的觀感中，大多是「一坯藁葬山塘路，英魂猶近要離墓」之類。<sup>131</sup>

至於虎丘山塘的各類寺院、祠宇，如虎丘山寺、天后宮、壽聖禪寺、報恩寺、普福寺、甘露律院、佛華禪院、茅山堂、戒幢律院、水映庵、吉祥庵（即劉猛將軍堂）以及蒼聖祠、孫武子祠、長涇廟、白公祠、甫里先生祠、周文襄公祠、陳公祠、申文定公祠、五人祠、張公祠、湯文正公祠、九賢祠、郡厲壇等，既體現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

<sup>127</sup> 〈吳葛將軍墓碑〉，收於江蘇省博物館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59年），頁415-417；（清）姚承緒：《吳趨訪古錄》，卷3，〈長洲（元和附）〉，「葛賢墓」條，頁78；（清）顧震濤：《吳門表隱》（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8，頁108。

<sup>128</sup> （清）吳深：〈過五人墓〉，收於（清）潘衍桐編：《兩浙輶軒續錄》，卷11，清光緒刻本，頁30b。

<sup>129</sup> （明）張溥：〈五人墓記〉，收於江蘇省博物館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59年），頁411-414。

<sup>130</sup> （清）顧公燮：《丹午筆記》，「五人墓」條，頁76。

<sup>131</sup> （清）姚承緒：《吳趨訪古錄》，卷3，〈長洲（元和附）〉，「五人墓」條，頁78。

化與記憶，也足士民之遊觀。<sup>132</sup>

譬如，在虎丘山寺以東，試劍石的左面，有一花神廟，內中因花草秀石之繁，而成爲士人遊觀的一大勝地。廟中的司花神像與侍列的12位花神，自明代洪武年間以來，成爲園客賽願之地，特別是每年農曆二月十二日的「百花生日」，廟中極形熱鬧。時人尤維熊（生卒年不詳）的〈花神廟詩〉稱：「花神廟裡賽花神，未到花時花事新。不是此中偏放早，布金地暖易爲春。」可爲一證。<sup>133</sup>此廟應該屬於虎丘梅花樓的花神廟，但顧祿描述的具體情形，則很像桐橋內十二圖花神浜的花神廟。在生活於乾隆至道光時期的吳縣人顧震濤（1790-？）有關蘇州五個花神廟的考證中，則區分得較爲清楚一些。<sup>134</sup>

再如，虎丘山南、建於道光五年的柳貞烈祠，是爲了紀念揚州人柳依依（1625-1645）。在其十八歲守寡，三年後逢江南乙酉（1645）之變，被亂兵掠去，絕食七日而死。其行爲在乾隆五十年（1785）被勒石，概括爲「捐生完節」四字。而吳周鈐（生卒年不詳）的〈柳貞烈祠詩〉，揭示此類祠宇被人們遊觀的意義所在：「山塘自古稱佳麗，俎豆應存激揚意。銀河矢潔定生天，長使人間清節勵。」<sup>135</sup>

至於著名的郡厲壇，就在虎丘二山門內。此壇累石而就，縱橫各三丈，高四尺。壇側豎有崇禎十一年（1638）巡撫張國維（1595-1646）禁雜派虎丘差稅碑。相關的祭祀遊觀活動，就在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展開，不僅要將府縣城隍神抬到這裡，而且要祭整個蘇州府的無祀鬼神。顧志沖（生卒年不詳）的〈吳中歲時竹枝詞〉描述了彼時虎丘山塘的景況：「會稱三節首清明，虎阜遊人逐隊行。一帶珠簾臨水映，白公堤畔畫船橫。」<sup>136</sup>潘陸（生卒年不詳）的〈十月朔看無祀會〉詩描述道：「吳越人好鬼，風俗自年年。百戲陳通

<sup>132</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3，〈寺院〉、卷4，〈祠宇〉，頁25-57。

<sup>133</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3，〈寺院〉，頁31。

<sup>134</sup>（清）顧震濤：《吳門表隱》，卷8，頁109。

<sup>135</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4，〈祠宇〉，頁54。

<sup>136</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4，〈祠宇〉，頁54。

國，群神冠進賢。氣喧秋雁後，花晚嶺梅先。不斷山塘路，香飄遊女船。」<sup>137</sup>

正因上述人文地景的豐富，山塘的生活空間顯得更令士人關注，而成爲他們休閒的重要選擇。一如明代蘇州民歌〈姑蘇風光〉（即〈大九連環〉）所唱的：「上有（呀）天堂下有蘇杭，杭州有西湖蘇州（末）有山塘（哎呀），兩處好風光。」<sup>138</sup>

## 五、煙月作坊

在清代中前期，附著山塘的街道、橋樑、河浜等處，熱鬧的街市、繁盛的生活、奢華的逸樂等，將山塘的中心區域融匯成人們眼中的「煙月作坊」，如時人所謂的「時際昌明，地當饒樂，肥魚大酒之場，紙醉金迷之窟」。<sup>139</sup>

虎丘山塘的「市塵如酒樓、耍貨，工作如捏相、洋人，舟楫如沙飛、鐙船，園圃如盆景、折枝」，在顧祿看來，都是「虎丘生涯獨絕」而他所罕見的。<sup>140</sup>

顧祿所謂的「獨絕」，揭示出了山塘生活空間的部分特質。這種在城市之外原本屬於「鄉野」之區的地方，因市塵、工作、園圃、宅第、祠宇、飲食、交通等生活的繁盛，早已淡化了這裡的城—鄉差異感，也使人們對「城市」、「鄉村」這類傳統觀念的區分，在這裡變得模糊起來，自然也構成了山塘區別於其他鄉村地方的重要特徵。

依照顧祿的記述，僅在山塘開店出售的「洋人」，時稱「自走洋人」，使用像鐘錶一樣的銅質機軸發條，都是山塘「附近鄉人爲之」，

<sup>137</sup>（清）顧祿：《清嘉錄》，卷10，〈十月〉，「十月朝」條，頁185-186。

<sup>138</sup>中國民間歌曲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民間歌曲集成》（江蘇卷）（北京：中國 ISBN 中心，1998年），頁714。

<sup>139</sup>（清）西溪山人：《吳門畫舫錄》，（清）郭麐：〈序〉，收於王稼句編：《蘇州文獻叢鈔初編》，頁744。

<sup>140</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凡例〉，頁2。

再轉售於市面的。產品主要有壽星騎鹿、三換面、老跔少、僧尼會、昭君出塞、劉海灑金錢、長亭分別、麒麟送子、騎馬韃子等。<sup>141</sup>另外，這裡雖然沒有閶門外南濠市面百貨叢集的那般繁盛，但也有可能流傳著來自海外（特別是日本）的洋貨。<sup>142</sup>再如，這裡的花市與花園子，也頗受時人鍾愛，其間形成的消費市場十分可觀。石韞玉（1756-1837）的〈山塘種花人歌〉說：「江南三月花如煙，藝花人家花裡眠」，又說「城中富人好遊冶，年年載酒行花下」，<sup>143</sup>賞玩得起的當然是那些有錢有閒者。到清代前期，因花市興盛，世代經營花業的居民，集中於山塘，形成了專門的「花園街」。清人周鳳岐的〈山塘花市〉詩稱：「行盡白公堤七里，萬花叢裡是青山。」<sup>144</sup>山塘的花樹店，有十多家，主要分布於桐橋以西。這些花店各有獨自的數畝養花園圃，稱園場，養花人則稱「花園子」。<sup>145</sup>天悔生（生卒年不詳）所著的《金蹄逸史》中寫道：「金閶門外南北兩濠，附郭臨流，舊為鬧市，實煙月之作坊，風騷之名跡。」<sup>146</sup>實非虛語。錢塘人張雲璈（1747-1829）還描述道：「七里山塘歌吹聲，畫船蘭漿鏡中行。勸君莫聽吳娘曲，恐有瀟瀟暮雨生。開尊須得酒如淮，斜倚篷牕惱客懷。茉莉珠蘭香滿路，晚風吹過井亭街。」<sup>147</sup>在興盛時期，虎丘山塘「花市則紅紫繽紛，古玩則金玉燦爛，孩童弄具、竹器用物、魚龍雜戲，羅布星列，令人目不暇給。至於紅欄水閣，點綴畫橋疏柳，鬪茶賭酒，肴饌倍於常價，而人願之者，樂其使也。雖遊者不無煩費，而貧

<sup>141</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10，〈市塵〉，頁150。

<sup>142</sup>參見賴惠敏：〈蘇州的東洋貨與市民生活（1735-17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頁1-48。

<sup>143</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12，〈園圃〉，頁166-167。

<sup>144</sup>（清）陸肇域、任兆麟編纂：《虎阜志》，卷6，〈物產〉，頁390-391。

<sup>145</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12，〈園圃〉，頁165。

<sup>146</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附記，謝國楨題記〉，頁180。

<sup>147</sup>（清）張雲璈：《簡松草堂詩文集》（道光刻三景閣叢書本），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集部第1471冊，詩集，卷2，〈山塘口號同應叔雅作〉，頁17a。

民之賴以養生者亦眾焉。」<sup>148</sup> 雖然這裡的生活會招致所謂「俗浮靡，人誇詐」的批評，而且實際上也確實存在「百工士庶，殫智竭力，以爲奇技淫巧」，<sup>149</sup> 以迎合各類人群的要求，但無論有錢有閒者，還是貧民大眾，都能在其中獲得各自所需。

而就時人於山塘的寓居情況來看，在顧祿統計的150處宅第園林中，除部分屬於明朝或明朝以前的陳跡外，多數是清代中前期士人的休閒安養之所。<sup>150</sup>

其中，顧祿看到的通貴橋以東的玉涵堂，是吳一鵬的居所。在他歸養故里後，就在山塘「辟堂築圃，引壘泉山，備遊觀之娛」。玉涵堂在清代被改作了戲園。另有真趣園，是吳氏的別墅。名士王稚登（1535-1642）的寓舍也在半塘，並曾寓居半塘寺，題其所居爲「半偈庵」。<sup>151</sup> 被李流芳（1575-1629）稱爲「好是幽人宅，偏於水木便」的陸廣明（生卒年不詳）、陸仲和（生卒年不詳）兄弟的宅第，也在半塘。有的人十分喜愛自己的別墅，對其優異處大加稱賞，如顧簡（生卒年不詳）在竹亭的寓舍，顧氏自題詩贊曰：「漸暖或妨出，微陰宜蕩舟。橋東紅藥好，何必主人幽。」<sup>152</sup> 其自傲之情，完全是因佔據了地理之便而生活十分優遊閒適之故。蘇州妓女影娘，「喜讀詩，每有會意，輒忘眠食」，其居所就在虎丘附近，環境優雅，「築小樓數椽，碗茗爐香，蕭然有出塵之致」，入其中者，「幾忘爲風流淵藪、時世梳妝」。她與僑寓蘇州的才子蘭陵夢生的相遇，就在七里山塘的舟船之

<sup>148</sup>（清）張雲璈：《簡松草堂詩文集》（道光刻三景閣叢書本），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集部第1471冊，詩集，卷2，〈山塘口號同應叔雅作〉，頁17a。

<sup>149</sup>（清）孫嘉淦：《南遊記》（一卷），收於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編：《山右叢書初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據民國年間刊本影印版），第9冊，頁6a。

<sup>150</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8，〈第宅〉，頁107-133。

<sup>151</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8，〈第宅〉，頁112。

<sup>152</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8，〈第宅〉，頁111。

上。<sup>153</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寓居生活的，大多不是本地人。<sup>154</sup>

像歸有光的曾孫、崑山人歸莊（1613-1673），「為人嗜酒，豪放不羈」，在明亡後就寓居於山塘的梅花樓。<sup>155</sup>

而那些南京的「舊院姝麗」，「賦性好遊」，往往因雅慕蘇州繁盛生活，即「輕裝一舸」移居於此。蘇州地方士人因此稱她們為「京幫」，以示其與土著之不同。其他有名的，還有所謂「維揚幫」，在時人眼中只能算是「京幫」的附庸。「京幫」中最著名者，當屬卞賽（即卞玉京，約1623-1665）、董小宛（1623-1651）等人，所謂「風流文采，傾倒一時」。<sup>156</sup>

「秦淮女郎」卞賽（自號「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十八歲時即出遊吳門，僑居虎丘山塘。在吳偉業的記憶中，卞賽「所居湘簾棊几，嚴淨無纖塵，雙眸泓然，日與佳墨良紙相映徹，見客，初亦不甚酬對，少焉，諧謔間作，一坐傾靡」。<sup>157</sup>他曾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以示愛意。其妹卞敏，也才貌雙全，被帶到吳門小居，「一時爭豔，戶外屢恒滿」。<sup>158</sup>

名妓董小宛，「天姿巧慧，容貌娟妍」，而且「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舍去」。因慕愛蘇州山水之美，徙居於此，在山塘邊築了寓舍，雖然只是竹籬茅舍，簡樸建築，但凡是經過其寓宅的人，經常能在戶外聽到詠歌詩聲，或者是鼓琴之音，體現

<sup>153</sup>（清）百一居士：《壺天錄》（上海：光緒間申報館仿聚珍板印本），卷中，頁34a。

<sup>154</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凡例〉，頁1。

<sup>155</sup>（清）陸肇域、任兆麟編纂：《虎阜志》，卷7，〈名賢〉，頁415；（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8，〈第宅〉，頁118。

<sup>156</sup>（清）陳去病：《五石脂》，頁354。

<sup>157</sup>（清）吳偉業：《梅村家藏稿》（華東師大圖書館藏清宣統三年董氏誦芬室刻本），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集部第1396冊，卷10詩後集2，〈七言古詩·過錦樹林玉京道人墓（並傳）〉，頁2b。

<sup>158</sup>（清）余懷：《板橋雜記》，卷中，〈麗品〉，頁37-39。

了主人的許多閑趣。<sup>159</sup> 她與著名文人冒辟疆（1611-1693）的情愛故事，<sup>160</sup> 在後世被傳為佳話。

另一位南京妓女沙宛在（字未央，號沙嫩），自稱桃葉女郎，與其姊游蘇州後，一起卜居山塘，「名噪一時」，時人將她們稱作「二趙」或「二喬」。<sup>161</sup>

本來，在清初人的觀念中，與其他地方相較，「吳門多妓女」。<sup>162</sup> 像上述這樣的青樓女子，多選擇虎丘山塘一帶為寓居之所，而非蘇州城內。主要記述乾隆末至嘉慶初期蘇州娼妓史事的《吳門畫舫錄》，就可以提供很多例證。如「柔情綽態，一時有牡丹之目」的杜凝馥（居下塘）、「豐肌弱骨，雅度翩躚」的崔秀英（居山塘彩雲弄）、「頎身玉立，如靈和楊柳」的史文香（居上塘）、「嬌麗無雙」的余鳳簫（居上塘）、「美而豔，面如滿月，光彩照人」的錢星娥（居下塘）、「飄逸輕盈」的童某官（居濠上）、「白皙而頎」的李倚玉（居虎丘得月樓）、「性亢爽，善飲酒」的陸沁香（居下塘）、「體貌閒暇，歌辭擅場」的錢夢蘭（居上塘）、「姱容修態，鬢輔承顛」的徐友蘭（居濠上）、「貌溫婉圓滑，捷給能得人歡心」的趙某官（居上塘）、「善居積，擅財貨，富甲教坊中」的徐素琴（居下塘）、「丰神駘蕩，鬢髮如雲」的李響雲（居濠上）、「略具資色」的陸氏順卿、眉卿姐妹（居濠上）、「貌清羸，細骨輕軀，可作掌上舞」的陳佛奴（居上塘）、「體閑儀靜，舉止端妍，無教坊囂張習氣」的孫素芳（居上塘）、「肌膚冰雪，曼睞騰光，調笑無雙，妖情宛轉」的沈笑霞（居山塘）、「蛾眉淡掃，豐韻天然」的陸小玉（居山塘）、「纖腰微步，羅襪生塵」的張鳳

<sup>159</sup>（清）余懷：《板橋雜記》，卷中，〈麗品〉，頁34-35；（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8，〈第宅〉，頁119。

<sup>160</sup>參見（清）冒襄：《影梅庵憶語》，收於《美化文學名著叢刊》（上海：上海書店，1982年，據國學整理社1936年刊本影印本）。

<sup>161</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8，〈第宅〉，頁119。

<sup>162</sup>（清）陸文衡：《菴庵隨筆》（臺北：臺灣廣文書局，1969年影印版，光緒二十三年吳江陸同壽刻本），卷5，〈鑑戒〉。

齡（居上塘）、「工度曲」的徐愛珍（居上塘）、「貌黑而津」有「墨牡丹」之稱的周新官（居山塘）等等，<sup>163</sup> 都堪為代表。

在山塘還有四位能詩工詞的「才女」的宅第，散處其中，即沈飛香宅（在綠水橋）、江珠宅（在金粟庵旁）、潘冷香寓舍（在虎丘下塘）和張榮華宅（在白姆橋）。<sup>164</sup>

而東山浜的抱綠山莊（或稱抱綠漁莊），就是顧祿的寓所。顧氏「恃才華，縱情聲色」，娶妾後，從塔影山館移居此地，<sup>165</sup> 將其裝修成東溪別業，所謂「挈蟾姬、鑿兒輩吟詩讀畫，消遣歲月」。這個別業的東、北兩面都靠河，「為競渡遊船爭集之區」。這樣的居所，自令時人羨慕不已。韋光霰贈給顧氏的對聯就這樣稱道：「如此煙波，只應名士美人消受溪山清福；無邊風月，好借瓊樓玉宇勾留詩畫因緣。」<sup>166</sup> 因為在清人眼中，龍舟競渡時節，實際上呈現出的是「畫船弦管醉飛觴，此是人間酒色場。任向橋邊費斟酌，也教傾盡富家囊」的生活圖景。<sup>167</sup>

除宅第園林外，山塘地區的服務業堪稱繁盛。

在斟酌橋一帶，還有不少酒樓，時人大概是看中這一地段適合舉行宴飲，有巨利可圖。這裡有三大酒樓，曾鼎足而峙。

首先是三山館，舊稱白堤老店，歷史最長，清初就已創建，不過那時「壺觴有限，只一飯歇鋪而已」。凡是往來過客途經虎丘，遇到風雨阻路，趕不及入蘇州城的，就在這裡住宿。酒樓的主人姓趙，歷數代經營，廚師的「烹飪之技，為時所稱」，吸引了大量的顧客；後來又建設了涼亭、暖閣，更使遊客們喜歡在這裡聚飲作樂。酒樓提供的滿漢大餐與湯炒小吃達上百味，風味獨特，聞名遐邇；盆碟有

<sup>163</sup>（清）西溪山人：《吳門畫舫錄》，收於王稼句編：《蘇州文獻叢鈔初編》，頁751-764。

<sup>164</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8，〈第宅〉，頁132-133。

<sup>165</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附錄·謝國楨題記〉，頁179。

<sup>166</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8，〈第宅〉，頁130。

<sup>167</sup>（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5，〈五月〉，「山塘競渡」條，頁84。

十二、十六之分；菜有八盆四菜、四大八小、五菜、四葷八拆，以及五簋、六菜、八菜、十大碗之別。每桌酒席必須在七折錢一兩以上，到十餘兩不等，價格顯然不菲。其次，是乾隆年間戴大倫（生卒年不詳）在引善橋旁、接駕樓遺址上所建的山景園，設計得如園林一般，具林亭之勝，酒樓中提供「冰盤牙箸，美酒精肴」，客人一到即先饗以佳茶，開了吳市酒樓之先。以上兩個酒樓，離虎丘較近，址連塔影園，點綴著溪山景致，可以說有「潤色太平」的味道，而且地當孔道，「凡宴會祖餞，春秋覽古，尤便駐足」。第三大酒樓，是嘉慶二年（1797）間有李姓者在塔影橋附近所建的李家館，道光時期更名聚景園，地理位置與人文風光俱佳。比較而言，山景園與聚景園「只招市會遊展」，而三山館一年四季，不斷烹庖，凡虎丘山前後居民有婚喪宴會之事的，都前來訂餐，生意極旺。對這些酒樓，時人的〈憶江南〉詞寫道「蘇州好，酒肆半朱樓」，趙翼（1727-1814）的〈山塘酒樓〉則稱「承平光景風流地，燈火山塘舊酒樓」，以及顧我樂的詩「斟酌橋邊舊酒樓，昔年曾此數觥籌」等句，都有不同的描摹，突現出彼時虎丘山塘的飲宴風尚。<sup>168</sup>

此外，虎丘的茶坊也很多，清代多屬四方游手、商人農民等人群的聚居休閒之地，<sup>169</sup> 為人們提供了檔次各別的飲料。這些茶樓都依著山塘河而造，有十多家，所謂危樓傑閣，裝潢極好。斟酌樓以東的情園茶樓，最受時人歡迎，在春秋花市和龍舟競渡時節，「裙衩爭集」；倘逢木樨花開之時，則香滿茶樓，更加令人流連忘返，<sup>170</sup> 別有一番煙花風月的感受：「小妓垂髻解弄笙，秋風悵觸舊遊情。琵琶低唱玲瓏月，好是秦淮水上聲。」<sup>171</sup>

所以，從某種程度而言，更令清代文人懷念的，就是這裡的風流

<sup>168</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10，〈市塵〉，頁143-145。

<sup>169</sup> 陳學文：〈蘇州的商業〉，頁159。

<sup>170</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10，〈市塵〉，頁146。

<sup>171</sup>（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5，〈五月〉，「山塘競渡」條，頁84。

韻事。當然，狎妓尋芳早已是士人生活圈中的風尚。<sup>172</sup> 吳江縣人葉楚僉（1887-1946）有過生動的描畫：<sup>173</sup>

風華少年，挾豔買漿，遊虎丘山塘間。夕陽欲下，緩緩歸來，輒集于方基。野水上杯，名茶列坐，笙歌隔水，珠玉迴波。星轉露稀，則兩行紅燭，扶醉而歸。洵夜景之解人，歡場之韻跡也。

在普濟橋下塘，有一個野芳浜，俗稱冶芳浜或冶坊浜。浜之本意，乃是泊船的河溝，所謂納舟之所。因河東岸曾為染坊漂布場，故又被訛作「染坊浜」，但實際上就是一個「粉黛迷津之所」，故一般以「野芳」為名了。據《任心齋筆記》稱，「吳人常時遊虎阜，每於山塘泊舟宴樂，多不登山。冶春避暑，吳娘棹船者咸集野芳浜口。」可見，這裡是當時一個娛樂的好所在。不過與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的是，這裡以男女尋歡為主。姜實節（1647-1709）的詩稱：「野芳浜口南頭岸，君住紅闌第幾橋。此日相思不相見，小樓春望雨瀟瀟。」攬雲居士（即箇中生，生卒年不詳）的詩更為直白：「薔薇新露貯清羹，桂楫蘭橈茉莉棚。覓得百花深處泊，銷魂只在冶芳浜。」顧祿解釋道，這個銷魂之處也就是「銷金之窩」。雖然這裡只是「蕩子銷金窟」，但為「貧兒」們創造了謀食的機會。<sup>174</sup>

由於地局水鄉，人們的出行與遊玩都愛坐船。在船上不僅能品賞湖光山色，還可以與朋友把酒言歡，其中樂趣非陸上行走者所能享得。在虎丘山塘一帶，有許多有名的舟船，可供人們遊玩之用，主要有沙飛船、郡城燈船、快船、虎丘遊船、賣水果子船、雜耍船、擺渡船、小艇（俗稱「關快」）等。比如快船，俗稱「搖殺船」，大的堪與

<sup>172</sup>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78-179。

<sup>173</sup> 葉楚僉：〈金昌三月記〉，收於王稼句編：《蘇州文獻叢鈔初編》，頁804。

<sup>174</sup> （清）箇中生：《吳門畫舫續錄》，〈紀事〉，收於王稼句編：《蘇州文獻叢鈔初編》，頁791；（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7，〈溪橋〉，頁93。

燈船相匹，用雙櫓駕搖，行駛迅速；小的只能容納三四位客人，故又叫「小快船」，行動更爲疾速，所謂「吳兒駛船如駛馬」；至於停泊的地方，也有專稱，叫「船渦」；掌櫓的一般都是婦女，當時有人作詩稱：「理楫吳娘年二九，玉立人前花不偶。步搖兩朵壓香雲，跳脫一雙垂素手。」有的船類似於揚州畫舫，專門蓄養歌妓以招引顧客，還有的船上與岸上共建歌院，顧客可以登岸尋歡。這樣的船，大多散泊於山塘橋、楊安浜、方基口、頭擺渡等處，行船時故意開得很慢，好像逆水行舟，歌妓們「分眉寫黛，量髻安花」，據說很令人銷魂。此外，船中弦索侑酒，還有辯發雛姬女扮男裝，多方取悅客人，俗稱「鼻煙壺」，言其年幼未解風情，只堪一嗅而已。所以，這類船一時被人呼爲「色界之仙航，柔鄉之寶筏」。<sup>175</sup>

一些富民豪商，競買燈舫，行至虎丘山浜，佔據柳陰深處，所謂賭酒征歌，「四窗八拓，放乎中流，往而復回，篙櫓相應，謂之水轡頭，日晡絡繹於冶芳浜中」。王岡齡（生卒年不詳）的〈山塘燈船行〉道：「江南夙號佳麗地，金閭習尚尤豪奢。山塘七里簫管沸，綺羅鎮日爭喧嘩。」<sup>176</sup>而在冶坊浜的得月樓上，可以居高臨下，俯瞰這種「歌吹遏雲，畫橈動地，紅妝與烏帽相掩映」的迷人圖景。<sup>177</sup>這些地方下層百姓一般不敢光顧，如果要坐船去虎丘、澆墅關等地遊賞，他們就到小普陀、花園弄口、快叻場、桐橋、缸鬚河頭、白姆橋、新橋、通貴橋、山塘橋這九個地方雇乘；駕船的都是西郭橋八都、九都地方的農民，早出晚歸，駛船捷如飛鳧，俗稱「關快」，但價格極爲低廉。<sup>178</sup>

顯然，在經濟上發展到一定水準，自然會導向更高的休閒生活

<sup>175</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12，〈舟楫〉，頁160-164。

<sup>176</sup>（清）顧祿：《清嘉錄》，卷6，〈六月〉，「虎丘燈船」條，頁135-137。

<sup>177</sup>（清）西溪山人：《吳門畫舫錄》，收於王稼句編：《蘇州文獻叢鈔初編》，頁753。

<sup>178</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卷12，〈舟楫〉，頁164。

追求。<sup>179</sup> 正如謝肇淛（生卒年不詳）所說：「田園精足，丘壑可怡；水侶魚蝦，山友麋鹿；畊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著膝間；或兀坐一室，習靜無營；或命駕扶藜，流連忘返。此之為樂不減真仙，何尋常富貴足道乎！」<sup>180</sup> 這在任何人看來，都是曼妙至極的生活境界。虎丘山塘四時不絕的畫舫笙歌的煙月生涯，<sup>181</sup> 是「掠錢買醉窮繁華」，<sup>182</sup> 也可以俞平伯（1900-1990）的一首絕句概括之：「水鄉隨處可停橈，斟酌橋樓舊酒招。豈獨蓴鱸櫻筍好，兒歌滋味夠魂銷。」<sup>183</sup>

## 六、餘論

晚明以來文人士大夫對於蘇州山塘生活空間的文字記述或圖畫描繪，既反映出人們對山塘圖景轉換的不同感受，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官、紳、民對這個獨特空間的不同感覺。不同時代的不同人群對地景的感覺，當然是不一樣的。從歷史文獻的記載來看，明代以降到清代中前期，山塘地景應該是有了一個層積、豐富的過程。其間呈現出來的人們對於生活空間的感覺、想像以及對美好事物的評判，都有趨同性，無論官紳士庶，都有可能在这些層面上獲致一定的認同感。但從清代後期開始，山塘地景發生了巨變，原有的生活圖景及其人群表現出了地域轉移之勢。

在顧祿描摹山塘生活空間的《桐橋倚棹錄》於道光二十二年

<sup>179</sup> 參見巫仁恕：《優遊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特別是頁26-53。

<sup>180</sup> （明）謝肇淛：《五雜俎》（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13，〈事部一〉，頁258。

<sup>181</sup> （清）西溪山人：《吳門畫舫錄》，收於王稼句編：《蘇州文獻叢鈔初編》，頁750。

<sup>182</sup> （清）顧祿：《清嘉錄》，卷6，〈六月〉，「虎丘燈船」條，頁137。

<sup>183</sup> （清）顧祿：《桐橋倚棹錄》，「附錄」，〈俞平伯題顧頤剛藏桐橋倚棹錄兼感吳下舊淙絕句十八首〉，頁175。

(1842) 刊行後的十餘年間，江南地區已經歷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亂等禍：「凡不忍見、不忍聞之事，忧心劇目，罄筆難書，所謂鐵人見之，亦當墮淚也！」<sup>184</sup> 顧祿等人記憶中的昔日繁華，已然不再。

1862 年來到上海的日本人有著清楚的感受：遠離上海三百餘里的蘇州城，受災嚴重，寒山寺即因「發賊之亂」而被損壞。<sup>185</sup> 謝國楨 (1901-1982) 指出，隨著太平天國軍隊的到來，清軍於退出蘇州之際，又舉火一焚，七里山塘繁盛之區隨之變為焦土。這也是俞樾 (1821-1907) 所親歷的巨變。而在這樣的大變化的時代，像寧波楊坊 (1810-1865)、杭州胡雪巖 (1823-1885) 與蘇州的顯宦們，都攜帶鉅資趨往上海。最終，蘇州由消費城市變成了工業城市，舊觀頓改。<sup>186</sup>

石渠 (1803- ?) 作於戰爭時期 (咸豐十年) 的詩，對山塘生活前後境況有深刻的比照：「咫尺山塘路，今來萬里難。況當除夕過，竟作異鄉看。兵燹留餘燼，民風失舊觀。一樽茅屋低，此味最辛酸。」<sup>187</sup> 舊觀不再、景象殘破的七里山塘，競讓蘇州人有「異鄉」之感。吳縣人吳嘉淦 (1790-1865) 就說：「吾蘇盛時，端午前後，山塘七里間，盛作競渡戲，畫船簫鼓，喧闐雜遝，入夜則燈舫絡繹往來，野芳浜中有煙月揚州之盛。意謂此樂吾生所常有，不意粵寇陷城，奸宄盤據有垂四年有餘……凡蘇之士民及四方貴人名流，莫不宴樂於此……收復之後，民力凋弊，……徒令遊者感念，盛衰之際，有不禁慨然不置者。」<sup>188</sup> 吳氏對於蘇州山塘全盛時期的生活逸樂在戰後的喪失，而在其遊記中充滿的哀傷感，也可以代表那個時代江南士民的普遍情緒。

<sup>184</sup> (清) 寄雲山人：《江南鐵淚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頁3。

<sup>185</sup> [日] 名倉信敦：《中國聞見錄》，收於[日] 日比野輝寬、高杉晉作等著：《1862年上海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361。

<sup>186</sup> (清) 顧祿：《桐橋倚棹錄》，「附錄」，〈謝國楨題記〉，頁180-181。

<sup>187</sup> (清) 石渠：《山塘除夕》，收於徐文高、夏冰編注：《山塘古詩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41。

<sup>188</sup> (清) 吳嘉淦：《虎丘遊記》，收於王稼句編：《蘇州山水名勝歷代文鈔》，頁373。

到同治三年（1864），時人仍未從飽受戰患而殘破的江南感覺中擺脫出來，稱「自滬至崑，炊煙縷縷，時起頽垣破屋中。而自崑至蘇境轉荒落。金閶門外瓦礫盈途……由是而無錫，而常州，而丹陽，蔓草荒煙，所見一律。」<sup>189</sup>袁學瀾（1804-1879）指出：「自粵寇游氛潢池，盜弄幾及四年，泊乎王師克復，……舉目有河山之異焉。夫以虎阜一隅，地當孔當……一時歌樓舞館，莽成丘墟，衣冠散逐鬼樓，台榭化為壁壘。昔之脂香漲川，血流紅矣；羅綺藻野，草蔓青矣。」<sup>190</sup>同樣，葉楚傖也將山塘繁麗生活空間變為丘墟的根本原因，都歸於這場戰爭：因兵變事起，「市廛櫛比幾盡付劫灰，燕梁鶯屋，大受創損。」<sup>191</sup>直到光緒年間，戰爭帶來的創傷依然沒有平滅，昔日的繁華更難以遽復。<sup>192</sup>蘇州地區的所謂「神女生涯之中心地」，像盤門之青陽地，閶門之倉橋浜，已成絕跡，無從尋覓了。<sup>193</sup>天悔生（生卒年不詳）在《金蹄逸史》中寫道：「庚申之役，景物一變。昔之列屋連雲，今則荒丘蔓草矣！昔之燕舞春風，今則狐嗥夜月矣！盛衰轉眼，過客興悲。」<sup>194</sup>

內藤湖南（1866-1934）認為：「長髮賊之亂的時候，江蘇一省大半變成戰場，惟獨這裡（指上海）因為有外國人租界而免受兵禍之患。避難的人們，無論富豪還是流民，爭先恐後聚集到這裡，突然之間就變成了一個大都市。所以到了今天，省會蘇州的繁華幾乎都轉移到了上海。」<sup>195</sup>戰爭導致了人口、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地域轉移之

<sup>189</sup>（清）毛祥麟：〈甲子冬闈赴金陵書見〉，收於謝興堯輯：《太平天國叢書》（臺北：京華出版，1968年），第13種第1輯，〈洪楊遺事〉，頁16。

<sup>190</sup>（清）袁學瀾：〈遊虎丘山記〉，收於王稼句編：《蘇州山水名勝歷代文鈔》，頁382。

<sup>191</sup>葉楚傖：《金昌三月記》，收於王稼句編：《蘇州文獻叢鈔初編》，頁808。

<sup>192</sup>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74-80。

<sup>193</sup>周振鶴：《蘇州風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影印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1928年印行本），頁91。

<sup>194</sup>（清）顧祿：《桐橋倚棹錄》，「附錄」，〈謝國楨題記〉，頁181。

<sup>195</sup>〔日〕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90。內

勢，於茲體現得相當明顯。

與江南其他城鄉地區的人們一樣，蘇州山塘士民的生活有了新的選擇。除了那些沒法逃移或不願遠徙他鄉而留居本地的人們之外，很多蘇州人移往上海。這個剛開埠不久的小城，迎來了外來移民的第一次高潮。可是為躲避「賊亂」而至上海的「難民」，均居無定所，「或佇立路旁，或以船為棲處，風餐露宿，饑渴交加，只為謀一日一日之生計。」其命彷彿懸絲，令外國人也頗覺堪憐；在這些「難民」中，「多蘇州之人，約有十餘萬眾。且官府無救彼等之能，餓死者日日增多。」<sup>196</sup> 到民國年間，大量底層民眾居住的生活空間仍相當簡陋。就像時人調侃式地講道：「在下所住的弄堂，房屋不過二十幢，而家家都是支棚搭閣，每一個門口祇少有四五個不同姓氏的戶口。」<sup>197</sup>

儘管如此，江南的繁華與生活的重心都轉移到了上海，<sup>198</sup> 也促動了江南士人對於歷史大變動下人生的新選擇，無論是思想觀念，還是生活方式。

---

藤湖南（1866-1934），1899年9-11月第一次來華，本書是該次旅華的遊記、雜感和評論合集，1900年博文館出版。

<sup>196</sup> [日] 納富介次郎：《上海雜記》，收於〔日〕日比野輝寬、高杉晉作等：《1862年上海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4。

<sup>197</sup> 平民：〈弄堂小史〉，《社會月報》1935年第10期，頁1。

<sup>198</sup> 馮賢亮：〈上海繁華：民國江南城鎮的社會變化與人生追求〉，載《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13年第14卷，頁283-305。

## 徵引書目

- 《社會月報》
- 《新路週刊》
- (宋) 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明) 牛若麟、王煥如纂修：崇禎《吳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明崇禎間刻本。
- (明) 王士性：《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明) 王錡：《寓圃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明) 王弼登：《訂正吳社編》，明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影印版。
- (明) 李流芳：《檀園集》，《文淵閣四庫全書》。
- (明) 林世遠修，(明) 王鏊纂：正德《姑蘇志》，正德間刻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影印版。
- (明) 皇甫汈等編：萬曆《長洲縣志》，萬曆間修、崇禎八年刊本，收於《中國史學叢書三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影印本。
- (明) 徐樹丕：《識小錄》，收於孫毓修編：《涵芬樓秘笈》，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
- (明) 張岱：《西湖夢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明) 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
- (明) 張岱：《陶庵夢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明) 張德夫修，(明) 皇甫廩等撰：隆慶《長洲縣志》，隆慶五年刻本，收於《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影印版。
- (明) 陳善等修：萬曆《杭州府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524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萬曆七年刻本。
- (明) 程春宇：《士商類要》，收於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上海：上

- 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明)黃省曾：《吳風錄》，明隆慶刻萬曆增修百陵學山本，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七年影印本。
- (明)楊循吉：《松籌堂集》，北京圖書館藏清金氏文瑞樓鈔本，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山東：齊魯書社，1997年。
- (明)盧熊：《蘇州府志》，洪武十二年抄本，收於《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432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版。
- (明)鍾惺：《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清)尹繼善、趙國麟修，(清)黃之雋、章士鳳纂：乾隆《江南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清)王芑孫：《淵雅堂全集·編年詩稿》，嘉慶八年刻本，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
- (清)王韜：《淞濱瑣話》，上海：新文化書社，1934年。
-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光緒十五年刊寒梅館藏版，馮賢亮藏本。
- (清)百一居士：《壺天錄》，上海：緒間申報館仿聚珍板印本。
- (清)余懷：《三吳遊覽志》，附於氏著：《板橋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清)余懷：《板橋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清)吳秀之等修，(清)曹允源等纂：光緒《吳縣志》，蘇州文新公司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
- (清)吳偉業：《梅村家藏稿》，華東師大圖書館藏清宣統三年董氏誦芬室刻本，《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
- (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清)李光祚修，(清)顧詒祿等纂：乾隆《長洲縣志》，乾隆十八年刻本，收於《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誌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版。

- (清)李銘皖、譚鈞培修，(清)馮桂芬等纂：同治《蘇州府志》，同治間修、光緒九年江蘇書局刊本。
- (清)沈德潛、顧詒祿纂，(清)許治修：乾隆：《元和縣志》，乾隆二十六年刻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
- (清)沈德潛、顧詒祿纂、(清)許治修：乾隆《元和縣誌》，乾隆二十六年刻本，收於《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誌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版。
- (清)冒襄：《影梅庵憶語》，收於《美化文學名著叢刊》，上海：上海書店，1982年，據國學整理社1936年刊本影印本。
- (清)姚承緒：《吳趨訪古錄》，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清)孫嘉淦：《南遊記》，收於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編：《山右叢書初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據民國年間刊本影印版。
- (清)徐崧、張大純：《百城煙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 (清)寄雲山人：《江南鐵淚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
- (清)張雲璈：《簡松草堂詩文集》，道光刻三景閣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
- (清)曹雪芹、高鶚：《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 (清)陳去病：《五石脂》，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
- (清)陳祖範：《司業詩集》，乾隆二十九年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影印版。
- (清)陸文衡：《齋庵隨筆》，光緒二十三年吳江陸同壽刻本，臺北：臺灣廣文書局，1969年。
- (清)陸肇域、任兆麟編纂：《虎阜志》，蘇州：古吳軒出版社，1995年。
- (清)華廣生：《白雪遺音》，清道光八年玉慶堂刻本，《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
- (清)箇中生：《吳門畫舫續錄》，收於王稼句編：《蘇州文獻叢鈔初編》，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年。

- (清)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康熙三十五年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影印版。
- (清) 談遷：《北遊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清) 歸莊：《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清) 顧公燮：《丹午筆記》，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
- (清) 顧祿：《桐橋倚棹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清) 顧祿：《清嘉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清) 顧震濤：《吳門表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日〕川勝守：《明清江南市鎮社会史研究——空間と社会形成の歴史学》，東京：汲古書院，1999年。
- 〔日〕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日〕日比野輝寬、高杉晉作等：《1862年上海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日〕名倉信敦：《中國聞見錄》，收於〔日〕日比野輝寬、高杉晉作等著：《1862年上海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日〕松浦章：〈清代江南內河的水運〉，《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頁35-41。
- 〔日〕松浦章：《清代內河水運史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9年。
- 〔美〕林達·詹森（Linda Cooke Johnson）主編，成一農譯：《帝國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美〕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葉光庭等編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美〕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英〕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上海：上海書店，2005年。
- 〔義〕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金尼閣著（Nicolas Trigault，

- 1577-1629)，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笈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澳〕安東籬（Antonia Finnane）著，李霞譯，李恭忠校：《說揚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國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中國民間歌曲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民間歌曲集成》（江蘇卷），北京：中國 ISBN 中心，1998年。
- 牛示力編著：《明清蘇州山塘街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王日根：《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 王正華：〈乾隆朝蘇州城市圖像：政治權力、文化消費與地景塑造〉，《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50期，頁115-184。
- 王俊年：《吳敬梓和儒林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王稼句編：《蘇州山水名勝歷代文鈔》，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
- 王稼句編：《蘇州文獻叢鈔初編》，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年。
- 王衛平：《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蘇州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 江蘇省博物館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59年。
- 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年。
- 呂作燮：〈明清時期蘇州的會館和公所〉，《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年第2期。
- 巫仁恕：《優遊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
-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李伯重、周生春主編：《江南的城市工業與地方文化（960-1850）》，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

- 李長傅編著：《江蘇省地志》，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鉛印本。
- 周振鶴：《蘇州風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影印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1928年印行本。
- 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1990年。
- 金閭區志編纂委員會編：《金閭區志》，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南京大學明清史研究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
-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徐文高、夏冰編注：《山塘古詩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曹子芳、吳奈夫：《蘇州》，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6年。
- 陳傳德修，黃世祚纂：民國《嘉定縣續志》，收於《中國地方志叢書》，民國十九年鉛印本，華中地方第170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影印。
- 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陸璣卿、顏大圭：《旅蘇必讀》，蘇州：吳縣市鄉公報社，1922年刊本。
- 費孝通：《費孝通論小城鎮建設》，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年。
- 馮賢亮：〈上海繁華：民國江南城鎮的社會變化與人生追求〉，《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13年第14卷，頁283-305。
- 馮賢亮：〈舟船交通：明清太湖平原的環境與人生〉，《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5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341-374。
- 馮賢亮：《太湖平原的環境刻畫與城鄉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 馮賢亮：《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 馮賢亮：〈嘉定古城攬勝〉，《地理知識》1997年第9期，頁27-28。
- 熊月之、熊秉真主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

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賴惠敏：〈蘇州的東洋貨與市民生活（1735-1795）〉，《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9年第63期，頁1-48。

戴鞍鋼：《港口·城市·腹地——上海與長江流域經濟關係的歷史考察（1843-1913）》，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

謝興堯輯：《太平天國叢書》，臺北：京華出版，1968年。

蘇州博物館、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南京大學明清史研究室合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